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323期

【思想文化】

小本子与翻老账

——文革随想录之六/老方

【百年国史】

刘志兰夫妇与我父亲/李飞飞

附：我所知道的“九五”前后/李飞飞

画说我的一生（26）/刘海鸥

——母亲的力量（1981-1983）

【评论】

刑余之思——聂元梓狱外随笔/聂元梓

【怀人】

王复光文革遇害五十四周年祭/王复兴

附：王复光的最后一封信

——1968年8月1日遇害前一天致王复兴

二姨妈，二姨夫（上）/张保和（美）

【访谈】

赵东辉口述：我没当上红卫兵/季烨记录 整理

【述往】

六年芝麻官——一个县委书记的实践与思考（四）/李辅

驱逐新鑫公司——一个县人大主任为民争利的故事/张树田

【书讯】

中英文版《镇反沉冤：我的劳改三十年》在美问世

【本刊声明】

【思想文化】

小本子与翻老账

——文革随想录之六

老方

文革那时候，很多人都有小本子，里面抄录着毛的旧语录和新指示，中央首长的讲话、大字报摘录、各地新闻，或许其间还夹杂着个人的经历、感受和评论。七折腾八折腾，有的小本子被没收了，有的遗失了，有的进了潘家园，有的还压在箱子底。如何消灭那些还留在世上的小本子，是执政党的难题。

聂元梓与谢静宜都有这样的小本子，作为能亲聆毛之教诲的极少数人，她们的本子里，记录的多是毛的话和党中央的声音。她们的小本子是指导工作的依据，要比寻常的小本子宝贵得多。

1969年5月，看了8341的北大简报，听了谢静宜汇报，在得知聂元梓一派不服，拿小本子说事的时候，毛泽东出离地愤怒了。谢静宜在小本子上记下了毛对聂元梓一伙的斥责——

你们今天，又翻起过去的小本子来压人，人家一批评你们就翻开小本子（过去的记录本）说，谁谁讲话肯定过你们，这个人承认过你们，那个人承认过你们，我就没承认过。翻那个小本子干什么？若是你们有理，得人心，不翻小本子人们也自然会承认你们。现在又翻过去的本子来，说明群众对你们不满，你们做的事不得人心，无非拿过去谁谁讲话压人，现在群众对你们干的事不满意，不得人心，翻本子也没用。

即使过去谁谁肯定过你们，那是肯定你们以前做得对的地方，没有肯定你们的错误。你“老佛爷”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文革，文革（指当时北大校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还革什么命啊？我看你们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83-184页）

毛发了雷霆之怒，是因为聂元梓翻了他的老账。这个老账在“谁谁讲话肯定

过，谁谁承认过”的后面，还可能扯出让他老人家更难堪的内容——北大一派掌权与中央文革的关系，北大两派分裂与“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与“天下大乱”“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关系等。这是毛无法面对，更无法解答的。

毛泽东给自己的老账盖上了遮羞布：“即使过去谁谁肯定过你们，那是肯定你们以前做得对的地方，没有肯定你们的错误。”他忘了一年（1968年7月28日），他在接见五大领袖时说的话：“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我们偏向你们五个，……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许爱晶《清华蒯大富》，369页）为什么宣传队一进校，聂一派就成了“不知羞耻”“不得人心”的“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了呢？

在中共历史上，不许翻老账是基本原则。为了大联合，1968年9月17日的《北京日报》，就用通栏大标题告诉人们“旧话不再提，旧账不再算，责任不再追，共同向前看”。80年代邓小平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其来有自。

《北京大学文革史权》的作者说，聂元梓就是毛泽东手里的一块石头。这个比喻挺形象——毛用这块石头将“盘根错节”的北大党委砸得“顷刻瓦解”。又用这块石头砸扁了北京市委，彭真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恶。在我看来，聂元梓不仅是石头，还是星星之火。毛从三张最早的大字报中，选定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因为这张大字报是个火种，如果把它洒向全国，势可燎原。

北京市革委会宣传组的史松，在回忆录中说到市委批判谢静宜的细节：

主持人：毛主席提出批林批孔，你在大会上又加上反走后门，毛主席很不满意，还批评过你，可有此事？

谢静宜：确有此事，我当天就找主席检讨了。我说，主席，是江青同志让我讲的，我一直认为江青让我干的事情都是您同意的，看来并非如此。以后她让我干什么，我都先向您汇报，您同意了，我再干，可好？毛主席点头同意了。主席已经谅解我了，你们为什么还不依不饶？

史松评论到：“这样的回答，让主持人无言以对，只好宣布散会。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惠宪钧讲：‘她手头上经常拿个小本子，记下主席的、汪东兴的、这个副总理的、那个副总理的什么话。斗她吧，她说什么事是谁说的，什么事又

是谁说的，你怎么给她判？’ ”

同样是翻老账，聂元梓跟工军宣队翻，就翻出了滔天大祸。谢静宜跟后毛时代的党委翻，就翻出了免于起诉。邓小平、彭真要重判聂元梓，就是因为她那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翻起了老账：“我们的大字报是贴在北大的，怎么跑到全国去了？”（《聂元梓遗稿》461页，美国华忆，2022）邓小平当然知道七人大字报是怎么跑到全国去了。但是他必须找个替罪羊。记得文革刚开始时，闻知师大女附中情况的邓小平说过，“我们欠账太多了，还不起。”组织还不起，就只好请个体来还。你聂元梓是党员，你难道不应该为党背背黑锅吗？

问题是，谢静宜也是党员，而且是党的高级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十大中央委员等等，官职一大堆。她不更应该为毛背背锅吗？别的不说，就说她和迟群把血吸虫肆虐的江西鲤鱼洲定为“五七干校”的校址。欺骗教师干部，“第一，（鲤鱼洲的血吸虫）已经治理过了，有毛主席的诗为证[毛《送瘟神》一诗尾联是：“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第二，已经有了预防的办法。第三，知识分子就应该到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锻炼一下。当地农民就可以长期生活在那里，我们为什么就不行？”（罗征启《清华文革亲历记》自印书，130页）清华先后有三千人（包括家属儿童）去过，有一千多人感染了血吸虫病。

聂元梓与谢静宜的罪名相同，都是追随林彪、四人帮，都犯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聂判了十七年，谢被作为宽大的典型而免于起诉。换句话说，尽管她们都有小本子，邓小平也一定要让聂元梓替毛背黑锅。

谢静宜是幸运的，她和迟群并肩出掌两校的大权，迟群因无缘接近毛，没有这个“护身符”而成了阶下囚。怀着对毛的无限感激之情，2015年，谢把小本子上记的鸡毛蒜皮辑整理了一通，写了《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一书。毛泽东泉下有知，会大感欣慰吧？

怕翻老账，是党的传统。后毛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长期任务，就是消灭小本子，消灭民间的历史记忆。赵园在《非常年代》的前言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谈到了消灭的具体措施：1986年11月，中宣部发出通知说：对专门叙述文化大革命史实的专著文章，未经严格审查，各出版社不要出版；各报纸、刊物和电台不要刊登、广播，对已经出版的这类专著文章，不发评论和消息。1988年12月，

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对出版文革类图书作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此类图书的出版发行。1997年对选题所做的调整，“看似报批面更宽，管控度更严，而实际上，一则凡‘涉及者’未必都属‘重大’，使本不‘重大’者也要去报批；二则凡涉及者又有许多未曾报批而出版的。这种对涉文革出版物的‘管控’，有违《宪法》关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承诺，到文革爆发50周年的2016年达于极致，甚至令人怀念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在国外’的反常现象仍在延续。”

于是《聂元梓回忆录》又出了新版，《聂元梓遗稿》也于去年问世。“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后毛时代的主政者任重而道远。📖

【百年国史】

刘志兰夫妇与我父亲

李飞飞

每一次的大变革若没有相对正确的思想引导，最终被野心家篡权，理想主义者和狂热分子，以及被裹挟者成为牺牲者。我由此更深刻地了解到，为什么美国独立战争人手一册《常识》？（著者托马斯·潘恩）美国的成功不仅是有华盛顿，更重要的是参加战斗的战士人手一册《常识》。在反“乌托邦”的人物中，我特别喜欢两个人，一个是奥地利人哈耶克，一个是英国人奥维尔。二人的生活轨迹主要在英国，一个小说家，一个经济学者，早期都是社会主义者，晚年彻底背叛了他们年轻时的信仰并从不同角度给以批判，也算一个偶合吧。他们的书也算我的重要启蒙教材。使我认识到在一个“乌托邦”的社会里，首先你必须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任何一个集体当目标一旦确立，群体将为之义无反顾。为达目标，不惜牺牲一切，甚至不顾其行为跨越人性底线。作为人怎么可以做这样的跨越呢？于是有良知的人受人性道德的考验退却了，他们被自己的良心淘汰了。那些不受良知约束的人冲到了前面。国际共运史，不正是这样一部典型的画卷吗？在集体主义的领域里，最终一定是跨越人性底线的“最坏者执政”（哈耶克语）就像《1984》

里的“老大哥”和《动物庄园》里的那只猪（奥维尔）。

我父亲有一个极近的战友叫续茂荣，续范亭将军本家侄儿，定襄老乡，在阎锡山军校时为同学，1942年投奔延安后又同为延安抗大教官，其夫人携三女儿千里寻夫曾上过延安报纸。我去他家做客时他给我讲了个父亲的故事。说到我们这些军人革命成功后该干什么的话题。父亲的理想就是不打仗我们没用了，年龄也大，最好的职业是看澡堂。门口炖上一锅羊肉，烫上二两烧酒，下班回家前泡个热水澡。共产主义各尽所能不过如此吧。然而，理想主义者都被他们的理想所欺骗。本文中我将把老前辈给我讲的故事说给大家。他们也曾是用热血追求理想的一代，但很悲剧，因为“乌托邦”里没喜剧。这些故事绝非虚构，但故事的述说者和听者不免存在着记忆误差，有不妥之处请谅解。

刘志兰夫妇与我父亲

陈守中，1932参加革命的老一代革命者，解放战争石家庄解放后曾在毛铎任书记、柯庆施任市长的石家庄市任公安局长。在任时经人介绍与左权前夫人刘志兰结为夫妻。解放初，任中共华北局工业部副部长，组建包钢后任书记。

刘志兰，青年学生时在北京读书，12·9抗日运动积极分子，后到延安参加抗日活动。经朱德介绍与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结为夫妻，1940年左权牺牲，六年后与陈守中组成新的家庭。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党校教育长，后调任包钢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父亲与刘陈夫妇认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包钢，在包钢时代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父亲是作为冶金部派到包钢筹建时的第一代负责人之一。陈守中为首届华北局解散后派到包钢的代书记、书记，刘志兰从北京市党校领导的岗位上随夫到包钢任职。一度陈为书记，父亲组织部长，刘宣传部长兼副书记，工作中有合作也有磕碰，但无恶交，刘志兰时龄四十上下，长的干练漂亮，作为女性见过大世面又是个充满激情的人。父亲作为年长者不知何故常在领导班子会上拿刘说事。有一次在党委会上将刘气得大哭，刘回家后拿丈夫出气，说：“你也不管老李，让他欺负我”。陈守中说：“我没觉得老李有什么不对”（此故事出自陈川生之口）。五七年反右，有人向党委反映说某处长说总经理杨维官僚主义是右派言论，杨坚持要打此人右派，父亲说，此话源头在我，难道杨维你没有官僚主义吗？陈守忠

和事说老李怎么可能是右派呢？此动议作罢。

还有一次，华北局开三千会，大会上华北局书记李雪峰点了家父在白云鄂博搞独立王国，扬言要派工作组查家父。刘志兰出于关心连夜给父亲打电话，让父亲小心。三人在包钢的关系由此可略见一斑。之后因分别惹恼了华北书记李雪峰相继离开包钢。父亲与李雪峰的关系已于拙作《知天命》中说过，不再重复，这里要说的是刘、陈二人来山西的故事，这也形成了刘、陈与父亲的深厚友谊。

父亲于1965年辗转回到山西，偶然发现刘、陈也在太原，便得空去串门，如果不是偶遇，作为一般工作关系而非生死战友，离开包钢也就终结了。可是有了共同的遭遇而又在异地相见，实有他乡遇故知的情怀。陈对我父亲讲了他如何离开包钢的过程。陈说：五九年反“右倾”时包钢将当时的总经理杨维打成了“右倾”并解除了职务，你是知道的，后来李雪峰来包钢逼着要给杨平反（因杨曾是李部下），我觉得不妥，处理杨维也不是一人所定，若要平反也不是一人说了算，于是我就把李雪峰的霸道作风给少奇同志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少奇同志把此信转给中央书记处，邓小平拿到信未做任何处理，便交给了同为书记处书记的李雪峰，告李的信李处理，结果可想而知。不久雪峰给我来了电话大加训斥，并说既然你不想干了那就别干啦，我说我只是客观地反映了一下情况，并非告恶状，如果这里不用我，我可否去华东或西北（华东柯庆施，西北刘澜涛均为陈的老上级）。李雪峰说道：华北之大难道无你安身之处？就去山西太原市当个书记吧。我提出带个秘书和司机（这原本是通例）也被恶言相拒。

父亲听完陈守中的苦诉，哈哈大笑并说，以你的能力和水平在山西最称职的岗位是公社书记。陈不解地说：我当一把手弱一点，太原当个副手应该没问题。父亲又笑着说你对山西不了解，这个副职干不长。没承想父亲的话竟成谶语很快就应验了。不久袁振反党案事发，陈、刘均被打成一案。此次父亲与刘、陈的闲聊成文革前的最后一面。（陈守中为党内忠厚诚实的老资格干部，能与父亲如此深谈可见委屈之深）。

文革开始，山西省委把刚从外地调回的父亲列为“第三类坏干部”（文革前期，山西省委以为这是又一次反右，让各级党委把所属干部分一、二、三、四类），父亲则一向认为山西省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小集团”，当然也成了积极反省委的参与者。因父亲作为一把手成功化解了本单位的矛盾，因此本单位除

了不敢乱说乱动的统战对象全体员工都成了父亲反旧省委的同盟军，并组织起战斗队很快杀向社会，（战斗队全称忘了只记得有“大无畏”三个字）对旧省委多次贴过大字报，成为当时反对旧省委的一支小有名气的队伍。

有一天晚饭后，好像是1967年1月10日前后，我陪着父亲在省政府前看大字报，人很多，突然看见有个妇女戴着口罩拍父亲的肩膀，我一时认不出来，父亲一愣神，那人摘下口罩，父亲对我一笑小声说这是你刘志兰阿姨，再往后一看还有一个大个头。父亲让我用自行车先带刘回家，这还是我第一次先由大人坐在后座上我再驮人骑车，搞得很紧张。回家不久父亲与那大个也走回来了，原来是陈守中。他们在父亲的房间里谈了很久，我只记得一觉醒来刘、陈还未走，谈话内容就不得而知了。只知隔天或两天夜晚父亲也参加了刘格平的会议，刘格平在会上拿出卫恒家一个断臂毛泽东瓷像和台湾反动传单说事，这就是所谓“1.12夺权”。如果这也叫夺权，父亲觉得有点儿戏。但他讲了他进去之后，刘格平曾当众对他大加赞赏，说父亲才是山西反旧省委的“第一张大字报”。尽管父亲对刘格平不甚了解，但至此父亲成了刘格平在“4.14”之前的亲信。

从此，我作为父亲与刘格平之间的联络员常去刘格平家。我第一次去，一位嘴角处好像长有一小痣的中年妇人接待我，自报家门后才知是丁磊。此后，我一去，她就操着山东腔大声喊：翠花，你同学来啦（刘与丁的女儿叫翠花）！后来有首歌词有“翠花！上酸菜！”回忆起来甚是有趣。

中央很快承认了以刘格平为首的山西夺权，但夺权者内部的利益纷争迅速明朗化。刘格平很想让父亲出来与丁磊组织一支属于自己的力量，就是后来的“东风兵团”。父亲觉得丁用的政府人员有许多品行欠佳，相当一部分是旧省委的骨干，只不过旧省委垮台后这些人善于钻营又在找新的靠山罢了。因此不愿与这些人合作，因而也就未介入“东风”的领导工作。

在新省委（党的核心小组）挂牌办公时，各级组织相继成立，父亲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同时任省委核心小组下属统战办公室主任（相当于统战部长）。刘格平对山西的历史不甚了解，因此常把父亲叫去咨询。在如何配备太原干部时，父亲提了个建议，父亲说袁振是个有野心的人，而积极参与夺权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又是袁振的队伍，放在太原有可能尾大不掉，无法领导，并建议由陈守中在太原组建班子。父亲说陈忠诚而无野心，又没有帮派队伍，这样会很好的支

持你的工作。不知是否父亲的作用，最终是陈来组建了太原的领导班子。当陈守中再来我家时好不威风，在父亲房间里谈话时大门口站着带枪的警卫，我的家连我都进不去了。这样山西夺权的结果袁振什么也没得到，这也为后来发生的“4.14事件”埋下了伏笔。

1967年4月13日下午(也许是4月14日)，丁磊突然派人去找父亲说有要事商量，当父赶到刘格平家时家中已是熙熙攘攘，丁磊还无暇与父亲说事，也不见刘格平，坐了近两小时也无法说话，但父亲已看明白了，丁磊正在用她所能调动的力量，包括“东风”“决死队”还有“兵团”的所属战斗队部署炮轰“刘、陈、刘”，父亲痛心疾首，眼见的革命成果即将断送，愤然起身离开。丁磊问父亲看清了没有？父亲说完全清楚。丁磊还认为父亲是支持她的嫡系呢，哪曾想，父亲是彻底看清了这一群高干也是一群投机的野心家。回家后疾呼“4.14”是个大阴谋，并以此为题张贴了大字报(4月28日，省统战部负责人李一夫贴出《强烈要求澄清四一四事件》的大字报——摘自红联站大事记)，表示对革命的失望和对刘、陈、刘的同情。父亲从此与刘格平分道扬镳，而与刘、陈、刘三者结成共挨批斗的患难友谊。之后的日子里，无论顺境逆境三人常聚，有时我也陪同，谈天说地，其乐融融，对于身处险境，早已置之度外。80年父亲去世，刘、陈到家中悼念，夫妇大恸。

不觉三十年逝去，三人加我母亲大概在天堂里谈笑风生吧，愿他们在天堂里依旧快乐。

陈、刘夫妇一对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忠诚，为人诚实本分。是为民族大义而献身的热血青年，只因人性未灭，为公理而得罪强权，无端被贬山西，受派性所累改变了人生轨迹，全家在文革中再次遭劫。难道这就是他们为此而奋斗一生的理想吗？

陈守中依党的原则给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写信，反映李雪峰的问题，刘转给邓小平，邓直接转给李雪峰来处理。被告办案处理原告，这样的自纠机制，令人哑然。

附：

我所知道的“九五”前后

李飞飞

山西 1.12 夺权，建立新政权后不久，各种势力因分赃不均或理念不同很快就势同水火。父亲作为刘格平倚重的干部被定为核心小组(代省委)下统战部(代统战部)主任，并被选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但在 4.14 事件中对其失望而分道扬镳。并在多次省委扩大会议上发难刘格平、杨承效，最激烈的一次大会发言后拂袖而去，并扬言退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会下曾多次发动正直的干部给杨承效、丁磊贴大字报，其中就有被杨打死的李希哲。李希哲有一段常去我家，下中等个头，一身警服瘦小干练，当时我母亲还想给北城区一女干警当红娘。有一次李希哲来我家时半个脸被打的青紫，警衣褴褛，身上是否有伤不得而知，那是被杨承效一帮捉去下的毒手。但他对杨成孝一点也不怕，他说一定与这个打砸抢坏人斗到底，那是我最后一次见李希哲，我母亲一个战友姓董也是公安干警就是她带着李希哲来的我家。一天急匆匆来到我家说小李子死了。我母亲听后伤心了好一阵。

还有一位薛姓转业军人是个医生，因代我父给杨承效在省府门口贴了一张反对打砸抢的大字报结果也被杨承效一伙打得遍体鳞伤、衣衫褴褛。薛医挨打的前一天来我家串门，聊天中父亲对薛医生说年轻人，你敢不敢给杨承效贴大字报，薛操着吕梁普通话说有何不敢。父亲立刻提笔我研墨，他边说边写，大笔一挥而就对薛说你替我当回宋世杰吧，说着署名薛 XX 后哈哈一笑。随即我与薛一起去将大字报贴在原省政府东侧墙上。

至此，父与刘、丁、杨如同水火，七月会议父亲也匿名去了北京，会上一看康生在主席台就座，便知“红联站”在中央败局已定，遂与同行的造反派说靠上已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赶快回去发动群众吧。没想回来不久就多次被抄家打砸，并抓走父亲。后来才知道，“九五”期间，他就被关押在省政府某楼地下室内。

“九五”那天我正在太原，当时父亲早已被造反派抓走多日，当时街上早已乱作一团，我家的位置与十中、省政府是个斜三角关系，两边对喊的喇叭都能隐隐听到。我家后一栋楼男邻居，是一处级老干部，他夫人也是个政府的副处长，

全家铁杆红联站观点，大女儿成 xx 是十中初一学生，也是马尚文的兵，嘴快腿快，一会儿跑到我家一下，报告十中被围攻的情况，一屋子人围在家中等待最新消息，不久传来政府开枪打死学生的消息，心中甚忧。

七月会议后没几天我家已被多次破坏性的抄家，家里的东西又摔又砸，我家有个五十年代母亲买的樟木箱，还有一个战争年代父亲用的手提箱，平时上着锁，可能放着母亲的宝贝吧，反正我没开过。造反派来抄家时，母亲紧着给他们拿钥匙，这帮人故意不用，随身带着榔头、改锥硬要砸烂。

还有一次，一个戴眼镜、着一身军装、长得挺敦实的青年人在抄家时，还乘机拿走我大哥的手表，我与他们以理据争：难道手表也是黑材料？他们才不得已归还，仗着人多势众顺手还给了我。抄家的主要有四野、永红的学生，背后是统战系统的，刘格平派干部躲在外边指点，我母亲知道他的名字与我讲过可惜我忘了，只记得姓张。

在一次抄家后父亲随即被他们抓走关了起来，后听父亲讲除了被他们批斗外，还多次行刑，包括老虎凳(说到此处父亲讲了个笑话，说上刑的人不会用老虎凳，最下边的皮带勒的位置不对，腿架的很高但并不十分疼痛，他也顺势呻吟，打手们看到如此高度怕腿弄断也就作罢了)。关押期还被打断一根肋骨。最可气又可笑的是，在“九五”那天刘政府的大喇叭却说十中藏有苏修特务高兴嘉，美国特务金谦寿，日本特务李一夫。父亲可曾是他造反路上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啊！父亲最早被关押的地点就在你省政府某大楼的地下室。可见刘氏之类政客为达目的，卑劣至极。

历史有许多巧遇，当父 1979 年去京看病住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竟与刘格平住对门，常常照面，却形同路人了。

同在中组部招待所的还有刘贯一，却因“九五”成了密友。与家父无话不扯，与此主题无关，就不再赘述了。值得一笑的是断不了与刘老杀盘围棋，互有胜负。我问：陈帅与你比水平如何？刘老笑着说：与我不相上下，爱玩而已，吹的凶。

补：文革中派性大字报传陈守中为左权秘书，近年来又疯传于网络，纯属胡编乱造。陈自参加革命从未与左权将军有任何交集，与刘志兰相识也在左权牺牲数年之后。特正之。

又补：1960-62年间因父亲为所辖区内共渡难关，提出“政治挂帅加山药蛋”的口号动员全民开荒自救。有人状告华北局，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在华北三千会点名批判我父搞独立王国当土皇帝，另搞一套，并说要派工作组来检查父亲。父亲没参加会议，刘志兰上会听到李雪峰动怒批评家父，十分着急，连夜给父亲打电话通报险情让家父早做准备。父亲听到后久等李雪峰检查组未到。即给李雪峰并华北局写了公开信，大意如下：听说你要派工作组来查我，我拭目以待三月有余你的工作组为什么不来？后内蒙古地方领导不想看父亲与李雪峰关系搞得太僵而受制，经协调把我父调到内蒙地方。因乌兰夫一向不买李雪峰的账，李雪峰鞭长莫及，对父奈何不得。直至65年家父因身体不好回到山西养老，才又有了与陈、刘夫妇的后续故事。📖

于2017年“九五”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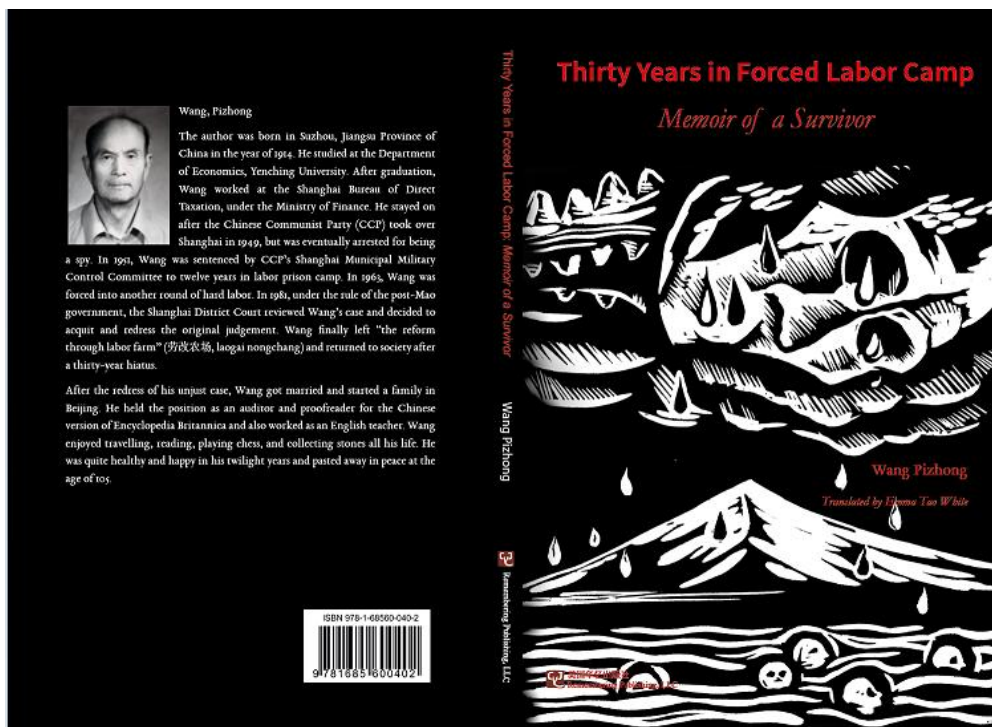
【书讯】

中英文版《镇反沉冤：我的劳改三十年》在美问世

中文版书封（美国华忆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英文版书封（美国华忆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



作者：王丕忠

译者：陶 钧

编辑：傅 蕾

封面设计：胡 杰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毕业于燕京大学，曾是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做职员。1949年后被中共留用。1951年中共“镇压反革命”，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判处他徒刑12年。监禁期间，他遭受了难以描述的恐怖和苦难。服刑期满后被迫“自愿留场就业”。1982年他获得平反。在1989年“六四屠杀”后，他以76岁高龄拿起笔，揭露镇反运动。全书以平实客观的笔触记录了许多监禁劳改、政治运动中的历史事实，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细节和佐证。📖

【百年国史】

画说我的一生（26）

——母亲的力量

（1981-1982）

刘海鸥



“抢生二胎”（该“抢”字是政府对生第二胎行为的描述词）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离经叛道行为达到的顶端。早在“婴儿潮”的时代，毛泽东一再宣传“人多热气高好办事”，将提倡计划生育的马寅初打为“马尔萨斯人口论”者。无节制的生育使中国人口暴涨，1949年以后的二十年间翻了一番，照这个速度生下去，中国不久就会出现人口过剩的危机。七十年代末政府终于算过账来了，开始提倡生“两个不少，三个多了”，却仍然遏止不了人口的迅速膨胀，八十年代初中国人口已经达到十亿，于是1980年中共中央以公开信的形式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只生一个好”。

说是“提倡”，一到了下边，就成了“强制”，全中国立即一阵风地推行“一胎化”政策。

本来我打算儿子四岁时生第二个孩子，读研究生的时候儿子才两岁，第二个孩子的计划推迟到研究生毕业。一看这形势，我决定赶紧再生一个孩子。政策阴晴不定，一日三变，对策只有一条——“赶早”。并非我特别喜欢孩子，更不是预见到四五十年后国家会出现人口危机，而仅仅是为我的儿子着想。我知道独生子女的成长中会有很多心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问题（后来无数的事实证明就是如此），我希望孩子在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下成长。更主要的是将来我们都老去，在这个充满功利，人情冷漠的世界上他们一定要有一个手足亲人相伴，难以想象一个人无亲无故孤独地活在世界上将是多么悲惨。我坚决不能让孩子成为独生子。



老宋的体院是计划生育先进单位，雷厉风行地响应号召。女人们已经没有了隐私，每月都要填写表格——月经什么时候来的，采取了什么避孕方法。对于已经生了孩子的家庭，更是迫使每个家庭必须领取“独生子女证”，需要在证上誓言并签字只生一个。想到这个巴掌大的一张纸将决定我儿子的一生，他的性格，他的生活以及一个独生子会遇到的全部问题，我的心里堵着一个大疙瘩。这个证压在我手里，没有上交，并且我拒绝领取每月5元的“独生子女费”。

不久得知，我们系研究生的党支部书记的太太在“只生一个好”的号召信发表后“抢生”了二胎。系里也没把他们怎么样，就是批评了一下，照样读研（毕业后正常分配也没受影响）。我当下决定无论如何我也要“抢”第二个孩子。

1981年，读研究生的第三年，我悄悄怀上了二胎。怀孕的前七八个月很顺利，没有人发现，正是最后一年做论文，在家写就可以。再加上我本来就胖，

肚子大点理所当然，怀孕的后期正赶上冬天，大衣一裹基本看不出破绽。那时风气不错，在公共汽车上人们会自觉给孕妇让座，但是我怀孕时没人让过坐，不就是个胖子嘛。



可怜的二孩在娘肚子里受到的“胎教”实在是残酷——因为心怀二胎，捕捉的负面信息特别多，全国各地强制执行计划生育的土政策让人胆战心惊。中央一声咳嗽，下面全都发高烧，土政策比中央还要厉害得多，这是他们邀功的资本。

在台湾的云子姑夫妇1980年底来中国探亲，次年去了姑父湖南益阳老家祭祖，回京时云子姑和我们说起乡间的计划生育，痛哭流涕——她亲眼看见一堆堆的妇女被塞到车上，拉到医院做人工流产和输卵管结扎，哪怕是已经怀孕八九个月的。车上妇女哭声震天，车下丈夫公婆撕心裂肺。对于怀孕七八九个月二胎的妇女被强迫引产，见到胎儿露头，不由分说，在胎儿的头上隙门处注射毒针，生下来的不是死就是脑残。云子姑哭道，没想到某党还是这么残忍。

对于反抗计划生育者各地有各种严厉的惩罚手段——“该扎不扎见了就抓”“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极端的手段遭到了民众的极端的反弹，弱小无力者的反抗是以自杀对抗，而执行者的对策是“喝（毒）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你爱死就死去吧。强者的反抗则是“你杀死我的孩子，我杀死你的全家”。那一阵“某家全家绝望自杀”“村长（或计划生育干部）全家被杀”这一类负面消息在我怀孕期间不时传进耳朵，威胁着我的神经，但是一旦一个小生命孕育在身，母

亲身体会迸发的能量无可匹敌，未来面临什么我都不怕，只有一个信念——绝对要保住这个生命。

惊恐和忧心，反抗和抵制，是我对腹中胎儿的“胎教”，真的对她后来的性格影响很大。



1981年十二月，我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了《红旗》杂志社。当人家问起我在什么单位工作，我根本说不出口，只因文革中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切意图都由《红旗》代言，它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起称为“两报一刊”，以“铿锵”的语言，犀利的骂语左右着文革的舆论趋向，堪称戈培尔式的宣传喉舌。文革结束后《红旗》已经声名狼藉，我非常不愿意在这样一个大染缸把自己蹭一身黑，但是我已经怀胎九月，只能先夹着尾巴做人，没有任何选择。

到《红旗》唯一的优越性是离我妈妈家近，怀孕后期我暂住在妈妈家，上下班走路只需几分钟。

我被分到科学教育部。一个五十多岁的先生和我在一个办公室，姓什么忘记了。我事先被告知这位先生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是“四人帮”的笔杆子，要注意和他的关系。我心里好笑，整个杂志社就是一个“四人帮”的宣传机器，执笔人不过是将意图落在文字上而已，大家都是乌鸦落在猪身上，不要说谁比谁更黑。坏事总是要有几个人拉出来垫背，文革结束后“四人帮”不就是个垫背的？

每天早上我到办公室和笔杆子点点头，他非常谨慎地不说一句话。部里没有给我分配什么工作，我每天阅读科学哲学的文章，做笔记。

九个月的身孕已经无法遮掩，来年1月17日孩子即将出生，我知道再难隐瞒，就在12月底向我部曾副主任坦白怀孕的事情。曾是一位老先生，只知道中央有一胎“号召”，不知地方上早已如临大敌。他波澜不惊地说：“到时候该生你就请产假走吧，但可能上户口比较难办。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具体规定，听说国务院正在起草一个文件，此外没有见过别的文件。”

就这么简单？好歹我能安心过一个年了。



可是体院这边没有让你过一个好年的意思。

体院已经有人发现了我的“形迹可疑”，报告了计划生育办公室。所谓的“计生办”只有一个女工作人员王苓田，听说有人竟敢在她眼皮底下大着肚子晃荡了九个月，她恨不得把牙齿都咬碎了，铁了心绝不让胎儿落地。

1月1日，1982年新年的第一天，王计生跑到我家强迫我去引产，我说：“这不可能，离预产期只有十几天了。”她斩钉截铁地说：“绝对不许出生！即使明天是预产期，今天也得引产，打一针‘天花粉’，胎死腹中就可以打下来了。”（天花粉是一种中药，七十年代后用于对临产产妇的“计划生育”。它的工作原理是使胎盘滋养层的细胞坏死，死细胞碎片留在血窦中，引起凝血，造成循环障碍和进一步的大量组织坏死，从而破坏了母体与胎儿之间的内分泌关系和代谢物的交

换，进而导致胎儿死亡，并引起子宫收缩而导致流产)。我没想到一个有孩子的妇女竟能轻描淡写地说出如此残忍的话。我也斩钉截铁地告诉她：“这绝不可能！我们单位已经同意我把孩子生下来。”

听到《红旗》的态度竟是这样，王计生气得发疯，她说：“你等着，我们会通知《红旗》把你开除公职！”她的态度如此强硬，并非因为她是一个忠于党的好干部，而是体院在清河地区连续多年被评为“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她每年可获200元奖金，她绝不允许砸了这块金牌。从这天起，为保卫腹中胎儿生的权利，我拉开了进行殊死斗争的架势与各种力量迎战。

王计生果然雷厉风行地到中央直属机关办公室告了《红旗》杂志社一状。中直机关很重视，派人去调查，要求严肃处理。这里我倒有点佩服王某，敢向中央机关挑战。



紧接着王计生动用了体院副院长找老宋谈话，告诉他将面临的处分会是夫妻双双开除公职，没收房屋，赶出北京。还是好好掂量一下吧。

尽管做了各种准备，这还是一个砸在我们头上的晴天霹雳。镇定下来再想想杀人不过头点地，一切事情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无所畏惧了。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我下了豁出去一切的决心。

离我的预产期还有13天的时候，《红旗》杂志也终于出手了，办公室主任、科教部主任，还有医务室管计划生育的李大夫叫我去谈话，中心意思是，《红旗》

是中央先进单位，影响至大，所以必须把这个胎儿打掉。我早已抱定死战到底的决心，我说：“这绝无可能，孩子在腹中已经成熟，是一条生命了，现在堕胎就是扼杀生命！”边说边大哭。见惯了下属唯唯诺诺的几个头头十分恼怒，又拿我没办法，只好结束了谈话。



事情当然没完，下午李大夫来找我，说带我去医院做个检查。我很疑惑，我的产前检查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李大夫说，就是检查一下，没有别的。看她态度很和蔼，去就去吧，怀孕以后我从来没有做过检查。当然我要非常警觉，不让医生在我身上做任何动作。

合同医院是公安医院，妇产科的医生问了我几句关于月份，预产期的问题。还没容我回答，李大夫抢上去说：“我们领导要求给她做引产。”原来看上去和善的她怀着这个鬼胎！我立即跟上：“我坚决不同意。”妇科医生看看我，态度十分严厉地回答李大夫：“这个引产我们不能做，孕妇不配合会出人命的。再说，胎儿打下来也是活的。”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几十年来我一直感激这位妇科医生。

李大夫因为没有“完成任务”，面孔黑黑拉得老长。在医院下楼时，我脚一滑屁股狠狠摔在台阶上，往下滑了好几阶，半天站不起来。她面无表情站在旁边看着，根本不伸手拉一把。估计她心里在想，摔流产了才好呢。



回到家后我感觉原来在肚子里欢蹦乱跳的胎儿纹丝不动。人家说孕妇怕摔跤，摔了后胎儿会在里面翻转导致脐带缠绕脖子窒息而死。我恐惧极了，立刻和妈妈到隆福医院检查。医生听了胎心说：“没问题，跳得很好。”又对妈妈说：“恭喜你，得个大孙女。”哈，要的就是一个女儿！



就在同一天，体院那边的王计生又出新招，她叫来清河地区派出所的警察，逼迫老宋交出我的户口，让警察把户口迁出体院，如此二胎就和体院无关了。老宋坚决拒绝，户籍警察知道无端撤销一个人的户口是不合法的，草草说了几句：“迁不迁自愿，你们要不愿意就算了……”就走了。又一场闹剧不了了之。



第二天《红旗》办公室主任又找我谈话，讲党性，讲纪律，讲下级服从上级。并以开除公职下了最后通牒。这几天的打压已经让我豁出去了。他说一句我顶一句，我强调中央只是“号召”“提倡”只生一个，后面还要加一个“好”字，明明是一种建议的口吻，而且从没说过“绝对不能生”，也没有形成中央文件。我充其量是没响应号召，并没有违反党的政策，更没犯法。要怎么处理都可以，孩子是肯定要省的办公室主任十分生气地结束了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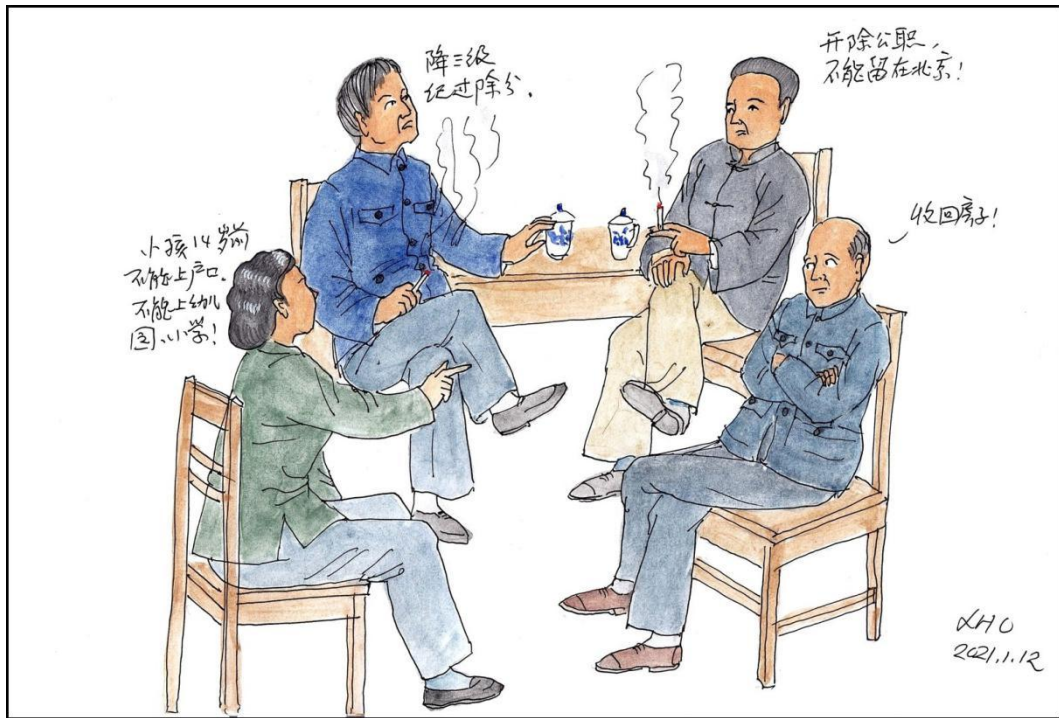
当天晚上科教部的党支部苗书记跑到我妈妈家找我父母告状，说我无视党的政策，顶撞领导，诬蔑共产党扼杀生命。他毫不客气地质问爸爸妈妈：“你们是怎样教育子女的？！”斥责和教训了一通就走了，爸爸妈妈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他走后爸爸气愤地说：“党棍！地道的党棍！”我奇怪难道这就是一个党的高级杂志的水平——员工有“错”还要殃及父母？我很抱歉我的事连累爸妈受辱，事实上我是怀孕好几个月后才告诉他们的，他们并不赞成我要第二个孩子，仅仅是出于父母对女儿的心疼，不愿我的生活受孩子太多拖累。但是一旦知道我怀了孩子，他们就完全地支持我，不管是道义上还是物质上。



王计生那边不达目的誓不休，又跑到北大闹事。一天晚上我的导师黄楠森先生突然到我妈妈家造访。他在1980年被任命为系主任，我觉得他实在不适合做行政工作，他是一个老好人，书生气十足，是专门做学问的人。自从当了主任，整天皱着眉头一脸苦涩地处理员工吃喝拉撒的杂事。这不，已经毕业分配出去的学生怀孕的事也让他一个高级学者来过问。那天下着雪，地滑，黄先生挤两趟公共汽车从北大摸到我家，真是不易。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他是我的恩师，对我悉心栽培，并且十分欣赏我的学习能力。

黄先生很无奈地说：“他们让我来和你谈谈。”我说：“黄先生，您也别劝我了，都到了这个时候，小孩是一定要生下来的。要说内疚只有一条——对不起您的培养。”我们一家和黄先生一起吃了晚饭，聊些文人们该谈的话题，然后我把他送到车站。看着他远去的影子，心里真的十分十分地抱歉。

王计生继续向北大施压，迫使北大出面带我去打胎。北大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两个妇女找我上医院“检查”。我说：“我还有六天就要生了，不需要再查。”她们说：“我们觉得你隐瞒了月份，看你的肚子最多只有六七个月，首先要检查一下你到底怀孕了几个月，七个月以前是可以引产的。”为了证明月份，我不得不跟着她们去了医院。妇科医生见多了这些案例，说道：“我们只给六个半月以内的孕妇引产。这个胎儿已经足月，不能再做，引出来的孩子是活的。”两个妇女跟我说：“你可想好了，后果你负责。”当然，我早就准备好承担任何后果。



《红旗》、体院、北大三方领导已经拿我没办法了，于是国务院中直机关召集开了一个三家四方会议研究对策，制定了若不引产就执行的处分。之后，体院党总支、教师支部、工会、计划生育办公室的领导找老宋正式谈话，传达了三家四方的处分决定——老宋降行政两级（由 21 级 62 元，降为 23 级 47 元）；取消讲师职称；取消教学资格；收回现住房等等。对我的处分是降行政两级（同样是 23 级 47 元）；记大过；开除出《红旗》，退回北大；不允许在北京工作。对于出生的小孩的惩罚是 14 岁前不允许报户口；不允许入托和上学……

好吧，一次一次的恫吓，不管真的假的，让我越来越无所顾忌，我已经安之若素。但我也不会乖乖就范，我决定写一封信进行申辩，交给国务院、《红旗》、体院。信一挥而就，三千余字。第一、我强调自己的理解是党“提倡，号召”生一个“好”（否则要个好字做什么），从未说“禁止，杜绝”。二、不能引产的理由——两个单位的计生办带我上医院，均遭到医生拒绝，这说明即使我愿意也没有可能引产。三、三个单位制定的惩罚条例，过于严厉。我在字里行间向他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你们的做法已经把我们逼上绝路，如果发生极端事件，就是你们造成的。

这是一封让我感到无比耻辱的申述信，为了保住胎儿及减轻“罪责”，我不得不详述自己私生活的细节——月经规律、停经日期、怀孕日期……像脱衣服一样，一件一件剥去，直至赤身裸体站在一群恶棍面前。为了不过分惹怒他们，我

还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他们的宽恕。至今阅读这封信仍觉得恶心，不想多看一眼。我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错，人口是应该控制，但是人口爆棚的责任不应该让老百姓承担。以我的个性本应该直接顶回去骂回去，在这一点上我和老宋有严重的分歧，他认为即使言不由衷也必须做出诚惶诚恐的样子，才会减轻责罚，赢得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他在我的信上做了多处修改，使语气软化。



信件交上去后，很快有了反响，1月16日，预产期的前一天。老宋的单位领导终于说了一句人话：“既然医生说了不能引产了，那你们就准备接受处分吧。”我单位领导也通知我，同意我生孩子，等生完孩子听候处理。

从我报告怀孕到终于获得许可的二十天里，我经过了感情上的大起大落，神经的紧绷和松弛，经历了我人生中最残酷无人性的遭遇。最大的触动莫过于文革之后在我心中已经摇摇晃晃的“伟光正”的光环完全黯然失色。

下面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哪儿生”。很多大医院已经不接收没有“准生证”（夫妻在怀孕之前必须获得准生证）的产妇。关于医生在接生时弄死第二胎的传言越传越盛，仿佛已经成为不争的而且也已经被广为接受的事实，我面临着孩子投生无门的困境。费劲了脑汁，想起了永丰公社卫生院，要不然我就在农村的卫生院生，多少农村妇女不就是在那儿生的孩子嘛。我的一个学生小高毕业后就在卫生院工作。我给小高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我的情况，问她能不能去永丰卫生院生小孩。小高回信说公社卫生院条件不好，最好不要在那生，但是她又给

我打开了一扇门——杨大夫的联系方式。杨大夫是卫生院资格最老的妇科医生，五十年代初就在永丰乡做接生工作。我在永丰时，经常与她公社学习班上见面，关系不错。现在她已经调到天桥医院工作。

我拿着杨大夫的地址抱着一线希望，去了城南她家，路上买了两三斤卖相十分糟糕的小梨当手信。杨大夫非常同情我的状况，毫不迟疑地说：“没问题，你就在天桥医院生，我们医院没有杀死婴儿的事。妇产科的主任和我关系很好，我会让她关照你的。”

一颗心终于落了地！



天桥医院是个区级医院，在一条小街里，一个小门脸，十分陈旧，和大田出生的北京妇产医院天壤之别。妇产科住院部好像只有一个病房，里面病床横七竖八，挤挤挨挨，住了大概八九个产妇，都是天桥一带的居民。虽然不太习惯，可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已经是天堂般的运气了。杨大夫也来病房看望过我一两次，让我心里很踏实。

应该1月17号出生的女儿迟迟没有动静，和儿子出生的情况一样。十几天过去了，医生说不能再等了，胎儿会死在腹中，必须引产。催产素连续打了三天，这倔强的婴儿就是不愿意来到这个世界。我疼得不能吃东西，呕吐绿水，半死不活。第四天，妇科主任来查房，认为是胞衣不破的原因，拿了一根大针准备把胞

衣扎开，看见那长长的钢针，我想起了消灭二胎手段之一就是等胎儿在产道刚刚露出头顶，就用大钢针扎入胎儿隙门害死胎儿于腹中，不顾一切坐起身大声喊道：“医生，别扎死胎儿！”医生说：“放心，不会的，我们不做那样的事。”



针刚刚扎下去，一股羊水汹涌而出，紧接着胎儿的头已经露出来，大家措手不及地把我搬到产床上，一个女婴已经叽里咕噜地冲出来了，8斤2两。哭声震天。我看了一眼，就和一切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眉眼难分，只要是健康的孩子就好。此时是中午一点一刻，立春到来的时刻。

妈妈爸爸非常高兴，写了一封大红纸表扬信《一针救命》贴在了妇产科。护士们轮流给我通报：“你的大闺女是我们妇产科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婴儿。”我去婴儿室看，女儿的眉心上点了一个大红点，只有她一个女婴获得如此殊荣。后来女儿跟我说，她还记得我和三姨去婴儿室看她，灯光很暗，她看见三姨俯身看着她，一张大脸在她上方。说的就是事实，真把我吓了一跳。

病房里还有两个生二胎的，一个是因为第一胎有问题，据政策规定如果第一个孩子有先天性疾病或残疾而影响生活者可生二胎。还有一个是因为第一个是女孩，夫家强迫她生第二个，谁知道历经磨难还是生个女孩，婆婆拉个脸子再也不来，丈夫唉声叹气，女的整天哭哭啼啼。



坐月子是在爸爸家。文革中我家的四合院收归国有，我们一家人挤在二十来平米的房子里。爸爸正在翻译《战争与和平》，只好住在出版社办公室。1980年听说台湾的云子姑要来大陆探亲，我写了一封信给周扬，借第四次文代会上“知识分子的春天”的主旋律和台湾亲人来访之机痛陈知识分子无房之苦。由周扬批准，临急临忙分了一套单元房接待“台胞”，新的，半毛坯房，在大北窑两条大街的把角，汽车噪音震天，但是到底解决了一点住房拥挤的问题。

我之所以在爸爸家坐月子，是因为三个单位已经多次光顾体院和妈妈的家，爸妈怕在月子期间那些人再去捣乱干扰我休息，更怕若回体院，那个恼羞成怒的王计生会下毒手迫害新生婴儿。这个担心不是没来由，女儿出生后，王计生还是不依不饶，乘败追击，写了一封告状信寄到妈妈的单位全国妇联，责令妇联对妈妈进行教育。

在爸爸家坐月子也没能躲过这帮家伙的搜索，《红旗》写了一封信寄到妈妈处追问我住在什么地方，以便当面宣布对我的处理。

我刚出院几天，《红旗》姓苗的书记和一个北大分配办公室的人就找到爸爸家，苗书记站在我床前宣布：“开除出《红旗》杂志，退回北大，记大过处分，工资降级……”我非常平静，面不改色地看他们离开。心中却是加倍地厌恶这个毫无人性的苗姓党书记，在《红旗》时听到他骄傲地跟别人谈论他的孩子柔柔，我心里想这么一个铁血党棍还给孩子取名“柔柔”，看出多爱他的孩子，而对一

个产妇和婴儿怎么就那么狠？

出了月子我回《红旗》的办公室取我的东西，临走时第一次和同屋的“四人帮笔杆子”说话，我说：“你要小心这个苗某某，他不是什么好东西。”“笔杆子”没敢接下茬，只是唯唯地点点头。我想，他们在《红旗》宫斗了这么多年，谁什么样心里门清，不必我说什么，我这么说就是为了解气。



月子期间，一天妈妈的朋友连贯访问她。连贯是人大常委会的副秘书长，搞统战、外事、侨务等工作。他的太太林琅和妈妈在十二集团军共同工作过，妈妈和他们来往走动很密切。为我的二胎事，妈妈曾去连贯家了解中央政策。连贯这次带来了一个消息：有一对在中国教书的美国夫妇即将回国，他们已经有三个男孩，又向中国外事处提出想领养一个中国女孩的愿望。他们保证要教会女孩学中文，等女孩该上学时带她回中国接受教育，并可以和亲生父母保持联系。连贯说他们考虑我的女儿最为合适，一方面女儿可以作为中美友好的象征，另一方面，如果我同意送出女儿，一切处罚全免，医药费及工资全部按照正常产妇待遇发放，还可以回《红旗》继续工作。妈妈问我的意见，我说：“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会把女儿送出去。”妈妈道：“说得好！”

也是差不多的时候，老宋收到一封信，是他原来的同事几年前移居香港的吴老师写来的，二胎的消息竟然传到了香港。信中说：“听说你生产的孩子遭遇困境，我可代为分担，只要将小孩送我，我可飞北京带返。”我们感谢他们的同情

和爱心，但是已经带着孩子过了七七四十九道鬼门关，我们绝不放弃。

大家开始绞尽脑汁给这个新生儿取名字。我说叫“铮”，她是我们拼命争夺来的生命，也希望她将来是一个铁骨铮铮的人。大家说“俗！”刘元写信来说叫“又佳”，两个字合起来是难，她是全家人经历了千难万险才保全了的一条生命。她出生之际，中国的世道也面临重重灾难。而“难”字拆开则是“又添一佳人”的意思。全家人立即通过了这个名字。

又佳很喜欢自己的名字，她七岁到澳洲至今从未取过英文名，恰好在英国意大利日本印度韩国许许多多的国家都有类似“又佳”发音的名字，根本不需再取其它洋名。



又佳满月后我们回到体院自己的家。刚一进家属院就被人们围上来，要看看“二胎犯”（这是他们对又佳的戏称）什么样，看到又结实又漂亮的又佳，都说：“值了！值了！罚多少都值。”又佳很快就成了大院里的宠儿，人们说她是体院最漂亮的小女孩，称她“体院一枝花”。走到任何地方“美眉”的喊声此起彼伏（我们称又佳“妹妹”，我家的贵州小保姆发音“美眉”，院子里的人都以为这是她的名字）。连从来不对孙儿们说一句好话的妈妈都禁不住夸又佳是“却嫌粉脂污颜色”的天生丽质。

正是女儿满月的那天，老宋单位对他宣布了体院党委计划生育扩大会议讨论

通过的处分意见（大概是特选的日子作为满月礼），并通报全院。在处分条例之前的引言充斥着文化革命式的语言：“充耳不闻”“置之不理”“长期隐瞒不报”“拒不执行”“说了许多不得体的话”“态度相当恶劣”“抢生二胎”“在院内外造成极坏的影响”等等。处罚的内容基本就是我生产前四方三家开会所决定的那些，加了一条“停发奖金五年”，减了一条“不让上学”。

这个处罚我们不接受，老宋开始写冗长的申诉，反复修改若干次，口气很强硬，令我对老宋刮目相看。

处分的通报在群众中传达讨论后，大家议论处罚太重，加上我们的申诉，院党委只好修改了决定，把停发五年奖金改为停发一年。把行政降级改为扣罚10%的工资三年（相当于降一级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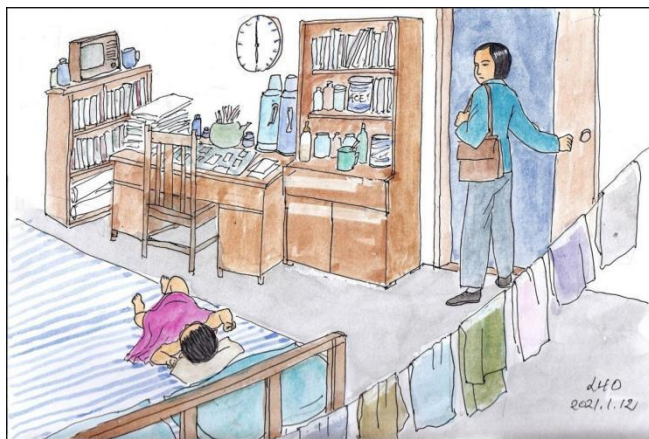


我被退回了北大等待重新分配，北大也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分配办公室的人带着讽刺的微笑告诉我，需要人的单位多得是，但是像你这样中央通报处分的人，没有人敢要。没有工作最大的威胁是没钱。全家靠老宋的五十几元生活，家里还有一个小保姆，只给人家十元钱的月工资。剩下的四十几元要维持五口人的生活。妈妈每月接济我十元，仍是不够，我必须想办法挣钱。刘元说她的同学小孙以前家里生活很困难，她给灯笼厂画灯笼挣点钱贴补家用。她拿了个样子给我，就是春节孩子们玩的折叠式灯笼，上面随意画几笔像个花就行，三分钱一个。



刚刚接下这个活儿，偶然碰见了初中好友小溪，在第八章我详细地讲述了我们的友谊。在我考上北大附中后，我们还常在假期见面，文革中她听说我去了那么多地方十分羡慕，我帮她搞了一张火车票，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后来他们全校到外地农场劳动，我们逐渐断了联系。听说她家搬到香山，我曾去访问，未遇。现在她已经是画家了。丈夫是同班同学，已经出国学习，她正在等待陪读。听说了我的困难她立即到中国画院帮我找了一个画画的活儿，还送了我一盒国画颜料。这活儿比画灯笼“高级”些——在绢纸上画出口的贺年片儿，画的是工笔花鸟山水国画，两毛钱画一张。

老宋做了一个灯箱拓样本，我练了几天，正式动笔。用了将近一天的时间（不算喂孩子做饭）画出了第一张。拿到中国画院交货，收货人不太满意，说画得有些愣（意思是生硬，颜色的衔接过渡不流畅），她拿画笔做了些润色，算是勉强通过。就是说我可以一天挣两毛钱了。（画面上的两张花卉是我练习时画



刚刚画了第一张贺年片，克阳又帮我找了一个工作——代课教师。她工作的分司厅中学需要一个英语代课老师，教两个班，每天四节课。按临时工算，每月工资31元，去掉了公交车月票5元，也就到手26元。我又放弃了贺年片，每天一大早六点钟出发，换三趟车，来回路上四小时去挣这几毛钱。现在想想其实不如专心画贺年片，画熟练了按流水作业的方式一天怎么样也可以画十张，得两元，一个月可拿六十元。可是按照那时的观点，人必须在一个“单位”工作，才算是工作，才有保障。我早起晚睡地挣这三十一元，结果本来就不富足的奶水“回去”了，那时又佳才四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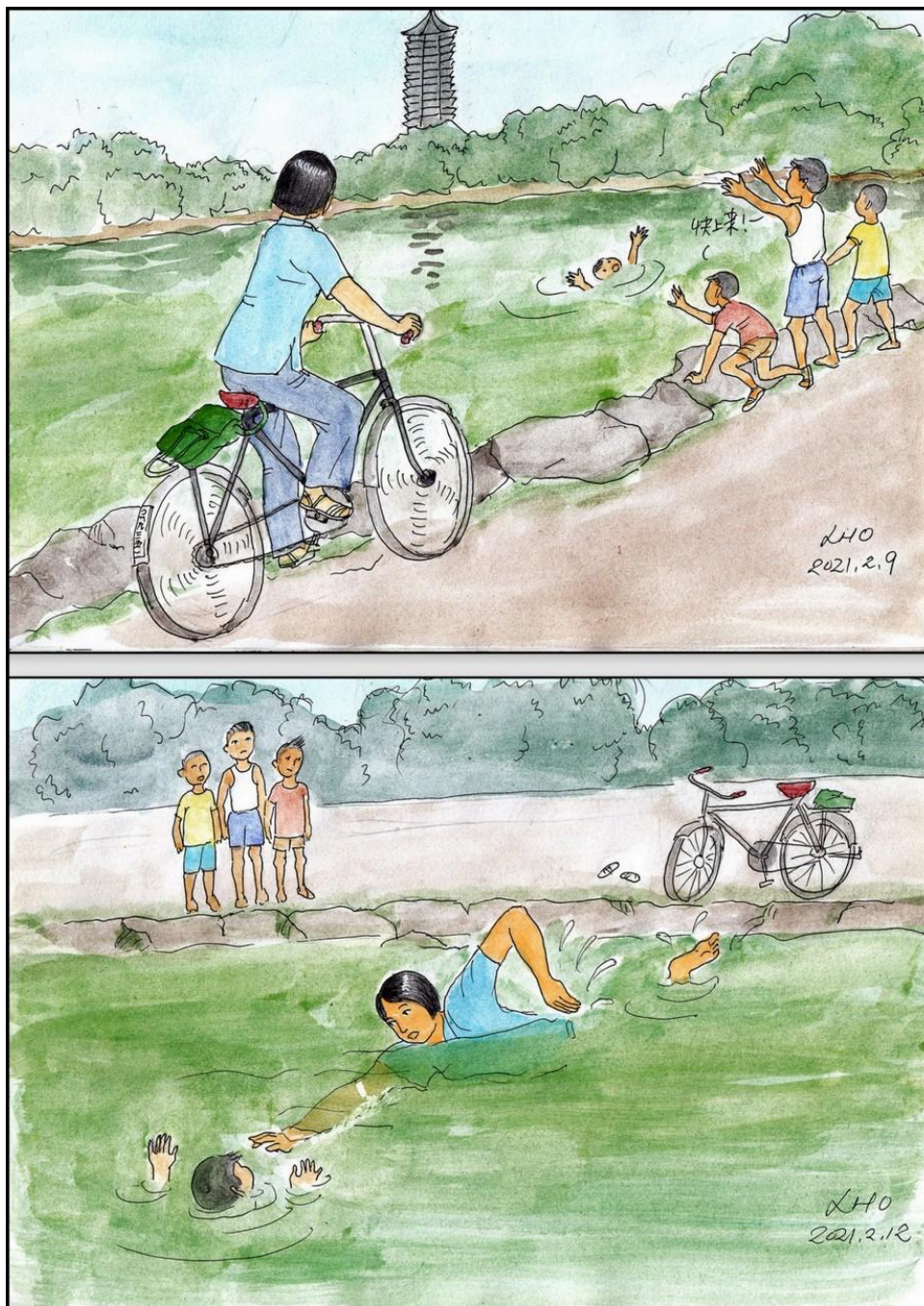
那个年代没有地方可以买牛奶，只有订奶一说，而成为订户，又有诸多条件限制，要凭婴儿出生证，老弱病残证明等等，像又佳这样的“二胎犯”更是难订到牛奶。月子里又佳靠的是克阳帮我搞来几张奶票再加上我的一点母乳，好在不久听到消息的大舅从香港源源不断寄来了配方奶粉。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怀孕期间的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1981年夏天，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已经交上去，就等着答辩了。因为腹部渐凸，我基本上在家待着，能不见人就不见人，偶尔到学校去探听一下消息。那天我去北大打听论文答辩的消息。

我骑车在未名湖边走着，忽见前面几个小男孩对着水中呼喊：“快上来呀！快上来呀！”扭头一看离岸边四五米远的水里，一个小脑袋一上一下地挣扎。我

赶紧跳下车，问那些孩子：“他会游泳吗？”“不会！”二话不说，我立刻甩掉鞋子，蹚入水中，我判断从湖岸延伸到水中应是有一个坡度的，不能跳。水下确实有坡度，但没想到是由石块堆积而成，一下水脚就被利石扎个钻心疼，跌倒在水里，我干脆顺势游过去。两三下就划拉到了孩子身边，一把抱起他。



站在水里，水淹到我胸部，对小孩子就是灭顶之灾。孩子小小的，在水中没有什么分量，惊恐地坐在我的臂弯上，双手搂紧我的脖子，像搂着亲娘老子。我小心翼翼地蹚着水，踩稳乱石间的淤泥把他抱上岸。



我问他：“小朋友，几岁了？”他还在惊慌之中，哆嗦着说不出话来。旁边的孩子代答：“他四岁。”“他怎么掉水里的？”“他自己下去的。”“家在哪儿？”孩子们指着远处一栋楼：“在那边。”我说：“你们把他送回去，要保证送到家里。记住不要再到湖边玩了。”几个孩子拥着他走了。

我没送他回家，我怕救孩子的事情张扬起来，会让我肚子里的五个月的小生命曝光，我尽量避免出头露面的场合。我一身透湿地骑车回家。跟谁都没提这事。

第二个，也是这个夏天。一天夜里我突然被窗外闪闪的亮光惊醒了，往下一看，路边一间小棚子着火了。这间棚子是一户外地人弹棉花用的。满屋都是棉花和棉胎，夫妻两人也住在里面。棚子离我们居住的楼房很近，周围都是大树，如果大树烧起来会威胁本楼居民。



我立即喊醒老宋，两个人拿了桶和盆奔下楼，同时也喊醒楼里的居民。一部分人在第一线扑火，一部分人在一楼的水房接水传出来。我完全忘了怀孕的事，一趟趟接过水桶泼向火场。救火车来时火已经基本扑灭，消防员反复喷水以防火势重来。棚子里没有人，大家分析弹棉花的夫妇一定是看到起火，迅速溜之大吉。

我本是个敬神不信神者，佛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救过一个溺水的小男孩，我勇赴火场，保护了大家的安全。这算是积德行善的事了吧，善举自有福报，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女儿的生命必是上天的奖励，是好人有好报的结果。



生活纵有百般困难，我的“二胎犯”女儿在亲人和朋友的帮助下快活健康地成长起来了。我感谢所有在此期间帮助过我的朋友和医生们。☺

【评论】

刑余之思

——聂元梓狱外随笔

聂元梓

1. 死讯不断

十七前我73岁，传记作家叶永烈在《购物导报》上刊登了聂元梓已经死了的报道。在这以后不断在全国许多城市的大小报刊包括北京的刊物上转载，乃至今年还有媒体在津津乐道地重复着十七年前的消息。我至今还健在，已经90岁了。

1. 十年文革无一梦

十几年前，台湾国民党元老丁中江先生曾送我一幅字，上面写着“十年一觉

文革梦”。字写得笔锋含蓄，韵律娴熟；但是这七个大字的内容与我实际情况不符。十年文革，我没有梦，一刻也没有！甚至是恰恰相反。

44年前我牵头写的那张大字报。关于它的出笼，各种演绎脚本层出不穷。这张大字报使我承载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罪名，恐怕将来政治历史学家们会以此来做这张大字报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最好的注解吧。

2. 猫乎鼠乎

文革进行到1967年夏，我对文革中出现的混乱状况，尤其是上层的复杂斗争感到忧虑，并对文革的搞法产生怀疑，想不干了，便在北大校文革会议上提出辞职，并建议解散校文革。不久又在周总理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要求。同时，还与我年轻时在战火中共同成长的好友杨惠文商讨。我把心中的疑虑、困惑、苦闷一般脑儿向她倾诉。她对我的状况感到非常惊讶，她怎么也没有想到我这个响当当的、光彩夺目的文革头头内心竟是如此的晦气。我万万也没有料到的是：她这个时不时被拉出去批斗的走资派却一身轻松。她说：“反正打倒的又不是我一个。”最后反倒是她劝慰了我半天，并提醒我退身避祸。

3. 整你没商量

九大由周总理出面点名，我成了高校唯一的候补中央委员，这在报上登了。但是有谁知道我参加大会之前、之中、之后一直是在被审查、挨批斗呢？可是到了九届二中全会时，却派生出我在会上会下如何如何。其实在九届二中全会中，我一言未发，而且拒绝私下串联。纵观台上台下的表演，我夹着尾巴做人。而时至今日在吴德、徐景贤的回忆录中还在传谣惑众。期间，只有邓颖超在去卫生间的路上提醒过我快做检讨，而且她在说此话时，头都不敢转，侧身轻轻地对我说完就径直走了。

我期待着有一天党的会议记录全部公开的时刻。

4. 阴阳乱谱

1968年8月工军宣队进校，10月我便被隔离审查、劳改，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整整八年。我以为我终于可以解放了，不过没高兴两天，当局者便宣布：“四人帮”对我的一切非法整治都依然有效。1978年4月19日，

正式把我逮捕入狱。同年在北京市批斗迟群、谢静宜时，竟然把我拉去，不是让我揭发批判他们而是陪斗，而且对我这个陪斗比对主斗还要凶狠。这两位当年批斗我时，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恐怕他们都始料不及。

我被捕4年多以后，1982年10月5日被起诉，1983年3月10日判决，判我17年徒刑。打倒“四人帮”的人给我判的刑，而刑期却把“四人帮”整我的8年时间也算在内。对于我个人来说，历史在荒唐地重复着，而且是更深层地谬误。

所罗列的罪状有哪一条是事实？证据何在？法院的人说：“你的判决书是我们念的，不是我们写的。”

在看守所监狱被关了5年多。1984年12月我被保外就医。1986年10月10日我被假释。按法律规定必须是在监狱里认罪态度好的表现好的才准许假释，而我从未认罪，那为什么对我假释？

5. 约法三章

我被正式逮捕关进监狱时，我一边表示不接受对我的指控，一边还给自己约法三章：第一是要吃饭，要尽可能多吃；第二是要保证睡眠，想尽一切办法睡觉；第三因为我是老党员，住进共产党自己的监狱，所以要自觉遵守监狱的规定。不仅如此，在狱中我还协助监狱的工作。此外在狱中我和我的看守成了好朋友。至今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还经常来帮助。

6. 戴在我头上的七彩帽子

社教运动中：破坏北大的团结；

文革中1968年3月后：杨成武、余立群、傅崇碧的小爬虫；

1968年工军宣传队进校后：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谢富治、反康生、反42年整风。

九大中：野心家；

九届二中全会：支持林彪搞串联、搞阴谋；

1968年10月以后：516骨干分子；

在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时：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的总后台；

1976年春：配合邓小平搞右倾翻案妖风；

1978年4月8日北大校党委：反革命分子；

1978年4月19日逮捕我之前，在北大的批斗大会上：北大和汉中武斗的后台；把杨勋抓入监狱，迫害北大群众；

1983年3月10日，法庭给我戴的一顶帽子是：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

许多媒体包括各种大小报刊、杂志、书籍，甚至电视台等也参与了破鼓众人捶的行列。把我妖魔化：乱世狂女、北大灾星、破鞋、坏女人、野心家、投机分子等等。

7. 控告北京大学

1984年12月16日，我走出监狱，当时解放的感觉自然是难以言表。但是第二天，便明白了我是从一个小监狱走进一个大监狱。一无住所，二无工资，三无医疗保证。监狱主管告诉我，国家有规定，以上的这些将由我原单位负责解决。从此我开始了艰辛地为生存权而拼争的漫长历程。写信、打电话、走访，但是二十年过去了，从我的原单位——中国的第一学府北京大学却没有得到一纸一文、只言片语！按规定即便是小偷、杀人犯、战犯都要给出路。北大分明是要置我于死地！

我保留向国家和联合国控告北京大学违犯人权公约，甚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权利！

8. 品味人间冷暖

1937年我16岁参加革命至1968年共31年后，1968年到1986年10月20日假释，其间被整18年。

时间对于一个人来说再长，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也是短暂的。在这漫长而短暂的几十年里，我感触颇多。

有时我就在想，都说在市场经济中人情淡薄。但是对于我来说，比起文革时期，我现在得到的，是……。

这几十年来，不断有好心人向我伸出援助之手，使我得以活到今天，并且写出自己的回忆录。这其中有送钱的，有送吃的，有送笔墨纸张，甚至有送桌椅板

凳，送碗筷的。前不久还有人给我送来两个书柜，这书柜里的书也几乎全是人们送的。在我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帮助过我的人，有我认识或不认识的，有见过或没有见过的，有文革中支持过或反对过我的。在此向那些在我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帮助过我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9. 回忆即思考，即创作

出狱后，许多人找我访谈，约我写回忆录。在这其中我拒绝了国外人士的合作。因为我不能把握他们在国外怎么说。我个人的遭遇是与国家的历史背景，具体人、事、时等等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不是表面文章可以讲透的。而且，更主要的是我怕他们实用主义，断章取义，拿出去做他们自己的文章。当然，心里有过反复，但是我有一个信念：个人与国家，分量还是得掂量好。

真正写回忆录大约是从1995年开始的，从始至终我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说真话。漫长的写作过程除了有生活条件的限制以外，还因为写作的内容、口气、观点也在不断地调整。最初我是有气，对专案组、对北大（尤其是对北大）、对墙倒众人推、以及一些极不负责任的传谣的人们心存愤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不断地倾听、学习、思考、反刍过程中，对同样的事件、人物逐渐地认识较全面、较客观、也较宽容了。对于那些强烈反对过我以及我反对过的人，也试图换位思考，重新认识这些问题。

此外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经常在我脑子里盘旋。比如我们经历过的以及正在经历的一切，其政治的、历史的、经济的、人性的根源是什么？哪些是能够避免的，哪些是不可避免的？

不断地反思使我认识到对许多事情的分析不能脱离我国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处的时段。历史的教训广义地说，我们这一代每个人都有责任，不论你是迫害人者，还是被迫害者。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有责任真诚地总结那段历史。

10. 深深的歉意

我写回忆录一个非常的意义，就是为那些在文革中受我牵连，而遭不幸的人们还其清白。在文革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事情极其复杂，其形势也变化莫测，许多人站队站在支持我的这一方，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早就不跟了，我已是上边的眼中钉。所以在历史进程中他们有许多人受到株连，被打成“三种人”、

反革命、“516”等等。似乎我的帽子不摘，他们的包袱也难以卸掉。我有责任把我在文革中的这段经历如实地写出来，还历史于本来面目，使无辜受害者得以解脱。

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我要向那些因为我在文革中犯错误而造成痛苦的人致以深深的歉意和忏悔。

12. 心存感激

北京市民政局从1998年底开始每月发给我600元的生活费，从2002年起我又得到了医疗报销的保证。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今年前些天，北京市民政局通知我，北京市已决定给我一套小三居居住。这使我终于有了定所，有了自己的家，结束了漂泊的生活。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心存感激。我还要活下去，我还会继续写下去。📧

2004.11

【怀人】

王复光文革遇害五十四周年祭

王复兴

亲爱的弟弟王复光于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8月2日，在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遇害身亡，去世时年仅24周岁。至今该惨案已过去五十四年了。我现今到了晚年，却愈发思念弟弟复光。有一个问题盘旋在我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复光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为着纪念复光并追究其死因，特写此篇祭文。

一、兴隆“八二”惨案

1968年8月初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正坐在北京西四家家的院子中（我每个周末从北大骑车回家看望父母，度周末），门铃响，邮差送来一份电报。我打开电报一看，不敢相信，电文只有五个字：“王复光死了。”电报是海南岛万宁县邮局发来的，不知何人所发，没有发电人署名。我猜这是某位有心人通风报信，但可能出于恐惧而隐名。

此前在1968年的7月上旬、中旬，北京到处张贴着有关广东、广西、湖南、四川、云南等地的武斗消息的大字报，标题有：“惨案报道”“十万火急”“血流成河”“紧急号外”等等。父母有不祥预感，我每次回家，都催我写信让复光赶紧从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回北京，以防意外。我连续发了两封“航空”信，催他回京。后来干脆在7月底给他发了一个“母亲病危速回京”的电报，骗他回家。结果在8月上旬收到这么一封匿名回电。母亲一看电报，顿时泪流满面，失声痛哭。我不相信是真事。那时没有手机，打长途也不知往那儿打（没号码）。只好往兴隆农场场部和所知的复光在兴隆的几个朋友处，发信了解情况。后来得知：在1968年8月2日深夜天没亮之前，兴隆农场以华侨知青为主的一派群众的宿舍区，突然被以农场老职工、基干民兵为主的另一派，武装包围。复光跑去军管会拍门报告，要军管制止武斗。军管会大门紧闭，无人应答。于是复光又往回（宿舍方向）跑。对立派民兵队长郭际标高喊“站住！”复光继续跑，背后枪响，郭际标开枪，复光倒地，背后中枪，不久气绝身亡。天亮后，场部对立派大喇叭广播：“狗崽子王复光已被打死！”他的尸体和其他几个尸体一起被埋入一片荒地的大坑里。埋葬之前，他手腕上的手表不见了。8月中，我在北京收到复光遇害前给我寄出的最后一封信。这时他已不在人世了。

以下是复光于1968年8月1日写下的生前最后的文字，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妈病重，我难道心里不急吗？但是现在走不了！根本没办法走！……关卡重重，兴隆一道，万宁一道，海口一道，大海一道，广州又一道……”他于此信前一、二天的另一封信中说，海口码头已被封，渡轮停开，他不可能游过海峡。以前复光回京，是从海口市乘渡轮过海峡，到湛江市坐火车回京。那时一般没人乘飞机，也没钱乘飞机。

从复光最后给我的信，得知他已收到我7月中旬给他连发的两封信。我在信中曾叮嘱他千万不要参加武斗。也许正是这样的叮嘱反而害了他。他如什么也不干、不动，或许没事，但他竟会天真地相信军管会，跑去军管会要求制止武斗。军管会为什么大门紧闭？敲门不开？里头的人应是早已知道要发生什么。制止武斗，难道不正是军管会的职责吗？此外，为什么封锁海口渡轮码头？谁封锁的？谁允许开枪的？8月2日在兴隆，在海南，到底死了多少人？海南岛“8.2”惨案是场蓄意屠杀、镇压。至今这个惨案的内幕尚未被揭开并清算。

后来我了解到，在8月2日及以后的几天，兴隆农场还有群众被杀，包括老人、小孩，许多人被打。复光的好友、印尼华侨郑文泰就曾遭关押、毒打。复光当时所在的兴隆华侨农场那一派，由绝大多数归国华侨知青组成，属于广东“旗派”。当年海南岛没有设省，属于广东省。广东的“旗派”是始终处于在野状态的造反派。广东省革委会成立于1968年2月20日，大多数县级革委会成立于3月。广东省革委会主任是黄永胜，兼广州军区司令员。广西省革委会成立于1968年8月20日，而广西各县成立革委会则比省会略早，成立于当年2月至4月。1968年7月至10月，在两广省、市、县革委会成立前后、主要的时间点是革委会成立之后，两广发生了大规模集体屠杀风潮，即史载的两广大屠杀。这是毛泽东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两广发生这么大的事，毛泽东当然很清楚，但与一年半之前的青海军区司令赵永夫下令向群众开枪事件相比，中央的态度截然相反，对两广采取了默许、纵容的态度。这就是兴隆“8.2”惨案发生的大背景。

研究两广大规模屠杀事件的文革史研究者，总结出两广各地的屠杀风潮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一是时间上主要发生在省、市、县成立革委会之后；二是造反派（广西的“四二二”、广东的“旗派”），与其他大部分省份不同，仍处于在野状态，而保守派在军队支持下进入了各级革委会；三是大屠杀是在没有发生武斗冲突的情况下发生的；四是越是偏远的农村地区死人越多；五是各级革委会普遍动用了民兵，甚至正规军；六是两广各级革委会是以贯彻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名义，实行屠杀；七是屠杀目的，在于彻底镇压“造反派”，巩固、恢复党的领导；八是大屠杀带有强烈的对造反派进行报复的意味；九是镇压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屠杀“黑五类”及其子女为重点，从而形成恐怖氛围，此点与1966年8月的大兴事件十分相似；十是中央没有强行制止。这十个特点，也就是兴隆“八二惨案”的特点，解释了海南兴隆于1968年8月2日为什么会发生惨案。

王复光出生于1944年，1950年6岁时随父母由美国归国，1963年从北京四中高中毕业，因父亲是摘帽右派且本人不是团员，考大学政审无法过关，没考上大学。1964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随北京华侨补校上山下乡青年报名团，到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务农。

复光遇害后，复光的朋友们从兴隆来信，劝我千万不能去海南处理后事，局

势很乱，去了危险。直至四人帮倒台后的1977、1978年，我托复光在兴隆的好友郑文泰寻找复光遗骨并带来北京。郑文泰和几个朋友在埋葬复光遗骨的荒地，挖了三天，找到许多遗骨，但无法分辨谁是谁，于是放弃。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家里没收到复光的遗骨。大约在1979年，家里收到兴隆农场场部托来京的复光友人带来的复光的几件衣服、钱包（无一分钱）、相片簿等遗物及农场给的几十元人民币抚恤金。我于1985年与郑文泰一起，从香港多次到海南岛兴隆农场做商务考察，我所在的公司当时有意与郑文泰的香港公司合作，在兴隆建一个生

产收录机、电视机的电子工厂（后来没搞成）。郑文泰让我不要对农场的人讲自己是王复光的哥哥，因为兴隆的派性仍很严重。但是我的身份还是传了出去，后来人们告诉我，杀害复光的凶手郭际标怕我报仇，躲到荒凉、偏远的东方农场，一躲好几年。大约在2000年时，复光原在兴隆的好友、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周国宝（文革后在深圳经商），高兴地告诉我：他一直关注郭际标的行踪，郭际标病死了。看来这个人晚年活的并不轻松。但此人一直没受到法律制裁。

我于1998年，从香港专程去到海南兴隆农场复光被埋葬的那片荒地进行凭吊，周国宝、郑文泰陪我去到那片荒地。我在那片荒地上挖了二瓷瓶土，含泪默哀，三鞠躬，把复光的魂灵带回北京。2000年时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了下葬仪式，把那二瓶土、复光的几件遗物、遗信一起下葬，立了一个衣冠冢。下葬时，参加仪式的复光的发小好友薛钟灵，要看看下葬的遗信，我给他念信时，情不自禁，号啕大哭，悲痛欲绝。

2010年在北京，我因要准备移民美国，在家里整理祖父王卓然的资料（老家的辽宁省档案局、抚顺市档案局以及九三学社主席都向我索要爱国民主人士、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九三学社”创立人之一王卓然遗留的文字资料）。我要把资料移交给长住北京的小弟王复强（他的香港公司在北京有个办事处）。在整理祖父信件时，我发现祖父写的一张纸条，这是祖父1964年10月某日写给复光的。纸条上写：“复光：爷爷出去办事，你等着我。你要去海南岛下乡务农，好样的！自古英雄出少年。父、母那里可能有阻力，我会做工作。爷爷留字。”我看完字条，情不自禁，又一次突然爆发，号啕大哭。我赶紧关上房门，不想妻子听见，痛哭了半个小时，真是悲痛欲绝。我自己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应，这是毫无征兆的不自觉的反应。那年我已67岁，复光已走了42年。这时，我才深深意识到，

复光的遇害，在我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那是我心中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痛。复光比我小一岁零三个月，我们从小一起玩耍，一起上学，一起练游泳锻炼，一起聊形势，一起谈文学作品，一起谈将来，一起长大。他是那样单纯、正直而又充满理想。我深感内疚，我是那么傻，竟会那么听党的话，鼓励他远离家庭到海南岛去务农，他本来是有机会留在北京当工人的呀！当年北京工厂已下了招工函，收他当工人，他却执意到北京华侨补校报了名，去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下乡务农，结果惨遭横祸！当我写到此节此处，仍禁不住热泪滚滚。

复光于1968年8月1日的绝笔信中，述说了广州、海南、兴隆的恐怖情景。他写道：“海口东方红已经被压垮，抓了一千多人（警司、工纠抓）。万宁也开始抓了，兴隆目前可以说是整个海南唯一剩下的还暂能正常开展四大的地方。但我方群众也在隔一两天就被抓或被打一两个（对方组级抓）……广州的旗派处境稍比我们好一点，被抓的没海南这么多，但几乎天天有人送葬（大多是旗派被暗杀……）”从复光在此信中透露的点滴信息，可知：当时广东省（当年海南岛隶属于广东省）正在镇压一派群众，即镇压广州的“旗派”、海南的“东方红”以及兴隆由下乡务农的归国华侨青年为主组成的群众组织。在海口抓人的是工人纠察队、警备司令部。当时掌权的革委会、军管会打着工人阶级的旗号，由军队公开介入，出动民兵，武力镇压另一派群众。复光在信中控诉：“什么‘镇压权、扫荡权、开枪权’，他们都有！”真是一针见血的控诉！何来“三权”！源自何处？谁人批准、下令？

二、毛泽东七·二八讲话

在复光遇害的1968年8月2日之前五天，仅仅相隔5天，毛泽东于7月28日召见了北京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有重要讲话。现在看来，此重要讲话与发生于1968年8月、9月、10月的广东、广西两广大屠杀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两者之间的逻辑线索十分清晰。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清华大学1968年7月27日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打死工军宣传队五名工人，并打伤731名工人、解放军官兵。为此，7月28日凌晨3时半至上午8时半，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紧急召见了时称北京地区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北京大学文化

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新北大公社实际领导人)、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北航红旗战斗队领导人)、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北师大井冈山公社领导人)、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东方红公社领导人)和蒯大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领导人)。以上五人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领导机构的正、副主任。(注1)¹

参加召见的还有时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文革最高领导集体)的成员: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另外还有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政委黄作珍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²

令笔者十分关注的是:其中在座的中央领导,有军头黄永胜,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统领全军“三支二军”文革工作)。黄此前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及广州军区司令员,1968年3月杨成武被打倒后,经林彪向毛主席推荐,黄从广东上调中央。因此从组织系统考察、分析,毛于7.28的讲话精神能急速、即刻下达广东省及广州军区并发生重大影响,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毛泽东此次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直接起因是1968年7月27日在清华大学发生的严重流血事件。这一流血事件源自清华大学文革群众两派,即作为激进造反派的“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和作为相对温和造反派的“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简称“四派”),主要基于关于文革的分歧和各自利益的分化,展开了持久的论战,并最终于1968年4月23日爆发了全校规模的大武斗。这场直至7月27日由于毛泽东派出工宣队才结束的、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的事件,共造成清华师生员工11人死亡,400多人受伤,经济损失无法估计。³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由来自北京61个工厂工人组成的、中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人员领导的三万多工人组成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进驻清华,制止武斗,遭到了团派的武力抵抗。而与此同时,四派采取了先是观望后是认可的态度。自中午时分至子夜,共计有5名工人被打死,731名工人、解放军官兵受伤。那一天,进驻清华的工人们和清华大学的所有人员都不知道这支工军宣队进驻是由毛泽东本人直接决定的。即使蒯大富

¹ 据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重新解读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所载史料。

² 同上。

³ 同上。

在那一天的下午赶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与吴德等人争吵，他都不知道工人这次进驻清华的内情，直至次日清晨见到毛泽东不久，才如梦初醒。⁴

7月27日白天韩爱晶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打电话，报告工人大队伍开进清华，答复无可奉告；韩给北京市领导人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众多的事例表明，毛泽东决定派出工军宣队进驻清华一事，在实施之前，仅限于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所知。毛泽东的这个决定的高度保密性以及实施的突然性，显然是颇有深意的。⁵

7月28日凌晨2时多，住在中南海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发生在清华大学的严重流血事件，毛泽东听后，惊奇之余，大为恼怒，脱口而出地说道：“造反派，真的反了！？”⁶毛泽东对于清华“七·二七事件”的即时反应，说明他在“本我”的“潜意识”中，已把造反派视为“真的反了”的对立面了。从毛泽东于睡梦中惊醒后脱口而出的这一句不自觉的话语，可以窥见当时毛在“潜意识”中，已十分反感造反派，充满着对其恼怒的情绪，存在着排斥、打压造反派的心理欲望。这种心理势必形成一种现实的打压动力。当时，毛泽东再也无法入睡了，他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在湖南厅召集会议，开始着手处理这一事件。

在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4人来到人民大会堂等待接见之际，他们在由谢富治领进会场时，才知道是毛泽东要召见他们。谢富治对聂元梓等四人说，“今天是毛主席召见你们，还有中央首长参加。”谢富治又重复说：“是召见我们，不是接见啊。”这次活动，正如谢富治所强调的，不是毛泽东接见，更不是会见，而是“召见”。“召见”一词的使用，表明了毛泽东实际上迫不得已地举行这次与红卫兵领袖的谈话，表明了红卫兵五位领袖在这次谈话中所处的尴尬或窘境。这次毛泽东与红卫兵五位领袖长达五个多小时的谈话，是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也是在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红卫兵头头们的正式谈话。从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清华发生流血事件的电话后赶往人民大会堂，到聂元梓等人出现在毛泽东等人面前，可以断定，毛泽东在召见这几位红卫兵领袖之前，已经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亦即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多数成员有过商谈。

⁴ 同上。

⁵ 同上。

⁶ 同上。

这个商谈的内容至今没有透露和解密。而这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体地与红卫兵五位领袖的谈话架势，非同一般，也从未有过。⁷

蒯大富因为忙于清华流血事件后疏散团派人员以及到北京电报大楼紧急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等等事务，没有及时赶来。毛泽东在谈话刚开始时，还有点不满地问道：“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谢富治、韩爱晶分别做了解释。由于在北京航空学院“暂时避难”，蒯大富是在7月28日清晨六时左右，才接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以及聂元梓的电话转告赶往召见会场的。

毛泽东在谈话一开始，就把向清华大学派驻制止武斗的队伍即工军宣队的决定当成他个人的不容对抗的命令。毛泽东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据事后作为进驻清华的工宣队指挥部成员之一的迟群的回忆，在7月26日，毛泽东在他的中南海住所里就派出制止武斗的队伍进驻清华问题，亲自做了决定，并在清华的地图前还对队伍的进驻路线，亲自作了具体的部署。⁸

当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个年头的1968年年中，全国已全面大乱，各地发生群众组织分裂，派斗激烈，发展到武斗，运动失控。毛泽东此时认为刘邓司令部已被打垮，准备召开九大，宣布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毛急于从乱走向治。毛要恢复并重整被他打乱的党国体制。此时，毛泽东觉得红卫兵造反派太不听话，一味热衷内战、武斗，争权夺利，成为由混乱走向党国专政治理的绊脚石。毛从内心对造反派红卫兵反感、厌烦。毛已从文革初期对造反派的爱护、支持，变成恼怒、压制。毛在7.28讲话中说：

“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

你们学校大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⁹

毛的话表明，文革运动已到了拐点，他做了新的战略决策。毛决定要把红卫兵造反派赶下文革历史舞台。7.28召见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有

⁷ 同上。

⁸ 同上。

⁹ 据《红色记忆》：《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版本01)》。

一段对蒯大富的轮番轰炸如下：

“毛泽东：……，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彪：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

陈伯达：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泽东：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主席早就讲，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¹⁰

话已讲得很明白了，“现在轮到”小将即造反派红卫兵“犯错误的时候了”，预示着轮到造反派挨整了。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¹¹毛对红卫兵造反派发出了严厉警告。毛讲明要由工军宣队干涉运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随后，毛泽东派出工军宣队开进全国高等院校及一切上层建筑领域。而工军宣队都是以军队首长为主导。此前于1967年3月，毛泽东已下令军队“三支两军”，军队早已介入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国许多地方如广东、广西早已实行军管。7.28之后，全国进一步进入全面军管，即军事专政。

毛决心以霹雳手段扭转乱局。在谈到制止武斗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时，发狠地说道：

“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在此处用了“包围”“歼灭”这类消灭敌军的军事用语。）

林彪接着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

¹⁰ 据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

¹¹ 同上。

（林直指某些造反派是“土匪、国民党”，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造反。把镇压矛头指向了造反派。到底谁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造反派”呢？到了地方上，就由军管的头头说了算，说谁是谁就是。）

毛泽东：“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¹²

（所谓围剿，后来在实践中，都是由民兵、地方武装部、甚至正规军执行的。）

所谓的“三权”：“镇压权、扫荡权、开枪权”，正是来源于此，来源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来自最高指示。这些7.28的最高指示，到了两广：广东、广西，就成为掌权的军事首长，支持一派，开枪镇压另一派（造反派）的最佳借口与“尚方宝剑”。两广于1968年的8、9、10三个月，在两派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的情况下，由正规军支持一派民兵，以落实《七.三布告》为借口，抓捕、毒打、屠杀造反派，即广东的“旗派”、广西“四.二二”派。发生了两广大屠杀事件。

在7.28召见会上，毛、林、周曾疾言厉色地追查、斥责全国各地到北京上访的造反派开串联会即“黑会”之事。毛泽东当场点了名，点了：广东的“旗派”、广西“四.二二”派。应是发出了严重警告。

毛说：“现在还在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广西“四·二二”、广东“旗派”被点了名，难怪马上倒了大霉。）

林彪：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恩来：“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林、周把各地造反派在北京开串联会，比喻成中共中央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斥责各地造反派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和中共中央分庭抗礼，眼里竟然没有天王老子了！）

毛接着说：“还说什么中央开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恩来：“北航开什么国防系统会议，开了没有？”

¹² 同上。

韩爱晶：“一吓没敢开。”

周：“不要开了。你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注13）¹³

（韩爱晶知道害怕了，国防系统的串联会“一吓没敢开。”，当时各地上访京城的造反派“黑会”也没开成。蒯大富串联会刚开就吓跑了。广西“四·二二”、广东“旗派”胆大，但没过几天就吓破了胆。两广大屠杀开始了……）

三、《七. 三布告》《七. 二四布告》与两广大屠杀

自1968年“7.28”毛泽东召见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为转折，毛泽东痛斥五大领袖打派仗，搞武斗，说“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毛在7.28把造反派赶下历史舞台，终止了文革的群众造反运动。毛要重建被他打乱的党政系统，重建党国的专政体系，于是开始镇压群众，打压一切与执政党离心离德的倾向。毛首先祭出的重型武器，即贯彻《七. 三布告》《七. 二四布告》。1967年从“一月夺权风暴”开始，全国各地造反组织纷纷在夺权过程中分裂，争权夺利，抢座次。支左部队大多偏向偏保守的一派，更加剧了派斗。激烈的派斗发展到武斗。两派群众竞争谁更革命，两派都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大旗，开展了你死我活的内斗。1967年底至1968年形成全国全内战，运动失控。如此局面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本人。1966年12月26日毛在生日家宴上，兴致勃勃地举杯向中央文革成员祝酒：“为1967年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乾杯！”1967年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传说陈毅元帅听闻江青此话，评道：“一句‘文攻武卫’，天下大乱！”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面对全国武斗乱局，毛泽东感到共产党的统治受到危害、动摇，决定“乌尽弓藏”，“兔死狗烹”，发布了《七. 三布告》《七. 二四布告》，警告造反群众，不停止武斗，就调动军队围剿，镇压。杀鸡儆猴，以儆效尤。毛泽东在“7.28召见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表示要强力贯彻“七. 三”“七. 二四”布告，杀气腾腾地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甩出了“包围”、“歼灭”这种狠话。许多人忽略了一个史实，7月27日工军宣队开进清华时，喊的口号就是：贯彻、落实“七. 三”“七. 二四”布告。《七. 三布告》，是指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

¹³ 同上。


央文革，根据广西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韦国清整理上报的广西造反派“四.二二”搞武斗的单方面材料，中央发布了制止武斗的《七.三布告》。命令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恢复铁路交通、上缴抢走的军队武器。号召严惩反革命分子。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小组、韦国清以《七.三布告》为根据，7月9日在南宁召开10万人大会，号召：“捍卫《七.三布告》”，“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严惩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为成立广西自治区革委会扫清道路”。然后支持“四.二二”对立面的组织“联指”，并出动民兵及军队，用武力血腥镇压“四.二二”造反派群众组织，屠杀群众达八万多人。广西多处发生了人吃人，杀死并烹吃阶级敌人的返古现象。在一片腥风血雨中，8月26日，广西自治区革委会在南宁成立。《七.二四》布告，是指196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针对陕西武斗不止，发出的制止武斗的《布告》。两个《布告》对广东产生了巨大影响。1968年7月30日（毛7.28讲话2天之后），广州举行了30万人的贯彻“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誓师大会，会议通过了《进一步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精神，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决议》。强调的是对敌斗争。会后，黄永胜、刘兴元、丁盛调动广州军区的部队，支持“东风派”，支持各地武装部、民兵，血腥镇压广东的老造反组织“旗派”。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委会成立，黄永胜任革委会主任。3月，丁盛调任广州军区任第一副司令，主持大军区工作；刘兴元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不久黄永胜调北京代替杨成武任代理总参谋长，遥控广东。当时主持广西全面工作的韦国清兼任广州军区政委，这很便于军事官僚把广西的文革经验移植到广东。1968年7、8、9三个月，广东省对旗派的镇压、屠杀，刽子手即黄永胜、韦国清、丁盛、刘兴元这几位军人专治的头头。笔者的亲弟弟王复光，当时在海南兴隆华侨农场务农，文革时属于旗派，他们农场那一派都是归国华侨知青。当时海南没有建省，隶属广东省的一个地区。王复光于1968年8月2日惨遭杀害。对立派的民兵队长郭际标从背后开枪，杀害了手无寸铁的复光。复光遇害一事具有典型意义。

1964年复光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到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务农，他多次受到场部表扬，被评为“五好战士”。关于海南岛于1968年8月发生大屠杀事件以及广东省文革大屠杀事件，《维基百科》的记载可以佐证。《维基百科》在“文革广东大屠杀”条目中，指出：广东文革屠杀事件“主要发生在1968年7-10

月间，由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各县革命委员会等机构领导。广东省是文革时期屠杀情况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与广西文革屠杀有一定联系，其集体屠杀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亲属的屠杀，另一类是政治迫害型屠杀。当时隶属于广东省行政区划的海南岛也发生了大屠杀事件，由当地的军队和民兵主导，其中儋县屠杀造成700余人死亡。”《维基百科》还指出：“文革期间，位于海南岛的儋县（现儋州市）、东方县等地发生了大屠杀，当时该地区属于广东省的行政管辖范围……1968年4月，‘海南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8月，海南岛的野战军、地方部队（包括炮兵）、民兵利用中共中央颁布的《七三布告》，对儋县各个人民公社、国营农场及198个老区村庄实行针对“反革命组织”的武装剿杀和烧杀。最终，儋县共有5万余人被关押，共私设500余所监狱，700多间民房被烧毁，数千人伤残，大屠杀共造成700余人死亡。”复光所在的兴隆华侨农场，属于万宁县，位于上述儋县、东方县附近。文革结束后几十年来，笔者一直在追索：复光之死，罪魁祸首、幕后主使是谁？以上《维基百科》给了笔者明确答案，《维基百科》在“文革广东大屠杀”条目中，指出：

广东文革大屠杀发生的时间节点，“主要发生在1968年7-10月间。”领导大屠杀的机构是：“由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各县革命委员会等机构领导。广东省是文革时期屠杀情况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与广西文革屠杀有一定联系，……”屠杀的对象（受害人）是：“其集体屠杀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亲属的屠杀，另一类是政治迫害型屠杀事件。”复光被害属于政治迫害型屠杀事件，并与他是黑五类子弟（父亲是摘帽右派）有关。大屠杀的执行单位是：“当时隶属于广东省行政区划的海南岛也发生了大屠杀事件，由当地的军队和民兵主导……。”注意：海南岛“大屠杀事件，由当地的军队和民兵主导。”甚至“海南岛的野战军、地方部队（包括炮兵）”也参与了！1968年8月，广东正值军管时期，能对军队和民兵下达命令，下令开枪屠杀百姓的人，只有广东军头：黄永胜、韦国清、丁盛、刘兴元。文化大革命期间，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位居全国前列。文革期间，不仅仅是领导干部受到冲击、迫害，普通群众，尤其是造反群众，更是受到大规模的迫害，甚至杀戮。特别是在文革的中期，在贯彻《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运动中，尤为严重、残酷。文革进入中期阶段，运动的特点不再是矛头向上，而是矛头向下，指向群众了。

中共声称要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但对于发生于五十四年前的具有国际影响的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的“八·二惨案”，却至今没有进行刑事调查，没有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审判杀人凶手，没有正式报告，没有展开法律程序。（法律有效追诉期早已过期。）这叫什么法制？让人们如何吸取历史教训？如何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四、光阴荏苒，岁月漂流，惊回首，王复光已离世五十四个春秋。一个单纯、正义、血性，而又充满理想的鲜活生命已经远去了！呜呼！安息吧，复光！你用生命告知我们的历史教训，将永远存活于人们的心中。复光，长路漫漫走好！

2022年7月2日

附件：

王复光的最后一封信

——1968年8月1日遇害前一天致王复兴¹⁴

复兴哥：22号信收到。

再说一遍，我给你的信不准给家里看！不准！！

妈病重，我难道心里不急吗。但是现在走不了！根本没办法走！

海口东方红已经压垮，抓了一千多人（警司、工纠抓）。万宁也开始抓了，兴隆目前可以说是整个海南唯一剩下的还暂能正常开展四大的地方。但我方群众也在隔一两天就被抓或被打一两个（对方组织抓）

什么“镇压权、扫荡权、开枪权”，他们都有。

我不愿讲得太多，走是肯定走不了，只好横下一条心！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即使坐几天大牢，也可以嘛。没啥了不起。

那种令人心烦的信不要再写些了。老实告诉你，我尚未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可是你们却还是一个劲地向我灌输投降主义、逃跑主义！我讨厌！

广州的旗派处境稍比我们好一点，被抓的没海南这么多，但几乎天天有人送葬，大多是旗派被暗杀。（不知江涌给你们去信否。）

再说一遍，我走不了。关卡重重，兴隆一道，万宁一道，海口一道，大海一

¹⁴ 为保持史料的原样，该信的文字、语气、用词、标点、段落一律按原件打印，不作任何更改。包括极个别的文字、标点错误亦不纠正。信的全文不增、不删、不改，以呈现其特定的时代烙印与特色。

道，广州又一道……

牢记林副统帅说过的一句话吧：“脓包只好让它穿透，纸里面，火横竖包不住。因此，我们只能面对现实，来解决它。”

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

弟复光，1968.8.1

【怀人】

二姨妈，二姨夫（上）

张保和（美）

我的外婆家是个大家庭，家里子女有十一个之多。所以我的舅舅，姨妈也就特别多。像许多中国的大家庭一样，外婆家里亲戚关系都很亲近，大家往来经常。在众多的姨妈中，我又和二姨妈，孙宜，及她的一家人最为亲近。因为我的二姨夫陶葆楷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二姨妈一家住在位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可能因为二姨妈挺喜欢我的，在我四，五岁时，她就带我到她家里住。从此，我就成了她家的常客，二姨妈家几乎是我的第二个家。

二姨妈于1989年过世，享年82岁，二姨夫陶葆楷则于1992年过世，享年86岁。在2006年二姨夫一百周年诞辰时，我曾写过一篇短文纪念他们。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一直非常想念他们。另外我又有了一些新的反思，新的想法，驱使我重新写一篇纪念他们的文章。



（1985年二姨妈和二姨夫摄于北京明昌照相馆）

无锡女婿

早年中国在婚姻上的一个习俗是不管是娶媳还是嫁女，一般都要找同乡。我外公那一辈，就是这种情况，不管是媳妇还是女婿，一律是无锡人。到了我父母这一辈，这个习俗就开始变化了。其中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就是大家开始走出家乡，走南闯北，这样碰到条件都合适的同乡的机会就少了。所以在众多的孙家女婿中，只有二姨夫陶葆楷也是江苏无锡人，是唯一的无锡女婿。二姨夫极为聪明，是典型的江南才子。按现在的话说，绝对是一学霸。其实很多所谓的学霸虽然幼时优秀，但后来成就平平。二姨夫可是从小到大，从大到老，一路霸道底。

二姨夫的父亲是无锡一中学老师。因他在一段时间里在天津工作，二姨夫于1921年在河北考区考取清华预备学堂。在清华预备学堂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土木工程学。

回到清华没几年，二姨夫在二十五岁时（1931年）即被提升为正教授。据我所知，他是迄今为止清华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据说在他被升为正教授后，学校又觉得他太年轻，又将他降回副教授。但过几天，觉得他确实达到了正教授的水平，又将他升回了正教授。因为他如此年轻，他的有些学生比他岁数还大。我们家的一个好朋友陈久真就是二姨夫这样的一个学生。二姨夫讲课深入浅出，非常受学生欢迎。即使在文革中，那些水平较差的工农兵学生也都喜欢他的课。文革中，二姨夫当然也受到迫害。但即使在文革初期挨批斗时，他还要每天坚持备课，虽然那时候根本不上课了。这是他几十年教育生涯养成的一个习惯，我想也是出于他对作为一个教师的信念。这些小故事是对二姨夫的才智和敬业精神很好的例子。

在民国时期，二姨夫曾任清华工学院代院长。当时，清华教授中的佼佼者数不胜数，如钱伟长，张维，周培元等等。而二姨夫能在众多的顶级人才中脱颖而出，成为清华工学院的管理者，也说明了他不仅在学术上是一个了得的人才，同时在行政管理上也有过人的能力。

到86岁过世，二姨夫基本上在清华教了一辈子的书，在市政，环境工程的研究和教学上成就斐然，桃李满天下。他的成就在网上多有记载，我就不在这里

重复了。在他过世后，他的学生在清华大学的环境系里立了他的一个铜像，以纪念他对清华，对中国市政和环境工程事业的贡献。

中源表哥和我的清华时光

在五十年代里，二姨妈家住在清华校园里的胜因院1号。胜因院是在抗战胜利后给教授盖的十几栋独立住宅。房子都盖在树林里，环境非常好。现在只有胜因院1号的房子还在，但也已经破败不堪，其余的胜因院的房子都已经被拆了，地用来盖楼了。在1960年后，二姨妈家就搬到了当时新建的16公寓203号，一直到他们过世。

那时从清华进趟城不容易。从胜因院或16公寓走到蓝旗营31路汽车站大概就要十几分钟。乘31路汽车到西城平安里终点站后，再倒一次或两次车才能到东城王府井附近的我家或外公家。整个路程起码要一个半小时。到了城里后，一定要在城里吃一顿饭，有时在我家吃，或在外面吃。有时也在我家住一晚，第二天再回校。后来我在网上读到因交通不便，旧时清华的教授都是这样做。我记得在大概4岁时，有一次二姨妈二姨夫到我家。我趴在二姨夫身上给他理个发，其实就是给他疏了几下头。二姨夫还给了我五毛钱，作为奖励或礼物。

二姨妈，二姨夫还送过我一个很大的礼物。在文革中的一段时间（大约从1968年到1970年）我父亲的工资从三百块消减到八十块，家里的存款也被冻结，使家里的生活拮据。在我1969年八月去内蒙上山下乡时，家里没钱给我置行装。二姨夫，二姨妈那时送了我八十块钱，解了我家的燃眉之急。八十块钱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我在内蒙的工资一月才五块钱。

我第一次去清华住是在大约四，五岁时，那时二姨妈家还住在胜因院1号。因为小，我还是由二姨妈带着睡。我还记得二姨妈说我睡觉时不老实，踢她的肚子。那时清华建筑系的吴柳生教授也住在胜因院，是二姨妈的邻居。我记得在房子周围的树林里和吴柳生教授的小儿子吴胜明一起玩。

再大一点后，去清华就是跟着表哥陶中源玩，因此我在很多方面受到中源表哥影响，特别是体育。因为多个原因，我本来体育很差。首先我父亲不谙体育，再加上生我时已经四十多岁了，他从没带我参加过任何体育活动。另外我所上的王府大街小学，因地处王府井闹市，空间狭小，体育设施很少。再有就是我自己小时个子很矮，又没有任何体育天赋，去少年宫或体校训练也没有我的份。但由

于中源表哥的引领和影响，体育和音乐，像游泳，滑冰，拉手风琴等，成了我终生的爱好。

清华是在1911年美国人以美国当时的一些名校作为蓝本而建立的，从教学，管理，体育等各个方面都引用了那些学校的系统和办法。当时美国的名校多在东部新英格兰地区，大多为所谓的常春藤学校。因新英格兰地区气候寒冷，冰球是这些学校的一项非常普及的运动。在建立清华时，作为体育教育的一部分，冰球也被带到了清华，这很可能也是冰球运动在中国的开端。

在很长时间里，清华的学生一直有打冰球的传统。我的大舅，孙修己，是清华经济系的。一次在一场校内的冰球赛中当守门员。当时还没有头盔和护脸的护具，对方的一记强力射门正中舅的嘴，将他的门牙都打掉了。因为在清华长大，中源表哥从小就打冰球。他给我讲起，在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包括他在内的一些清华子弟曾和一帮外国留学生有过一场冰球比赛。中源比我大八岁，他六年级时，应是1958年左右，那时的外国留学生应该大都是从苏联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来的大学生。苏联地处寒冷地带，冰球水平很高。这些人根本没有把既没有冰球传统，又只是小学生的对手放在眼里。但那场比赛清华子弟大胜，因此一战成名，那些清华子弟大都成了后来北京市冰球队的成员，中源表哥又是其中的主力。我还记得冰球队成员有吴柳生教授的儿子吴迟敏，北大赵林克蒂教授的儿子赵霞等。后来赵霞还是我在北京什刹海体校的教练。

提起五十年代在中国的外国人，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在很小的时候，大约也是五十年代末，在一个冬天的早上，我和父母在东长安街北京饭店前经过。那时有三个北京饭店，五十年代建的北京饭店，民国建的北京饭店，及清朝建的北京饭店，从西向东排列。后来清朝建的北京饭店被拆了，在七十年代盖了一个新的北京饭店。那时因为汽车少，在北京饭店前基本没有停车场，而是一些绿化带和一个篮球场。那天我们经过时，有几个欧洲孩子在那个篮球场上玩球。那时外国人很少，一帮中国人围在篮球场四周看热闹。我也跑过去看。这时，欧洲孩子玩的篮球滑向了球场的边缘，被看热闹中的一个学生模样的中国人捡了起来，还给了跑过来捡球的一个欧洲孩子。这本应该是值得道谢的一件事，但那个欧洲孩子不但不领情，反倒非常生气，气势汹汹地瞪着那个中国人，并将其所戴的鸭舌帽扔到地上，以示侮辱。这时，那被欺负的国人倒是没有什么反应，但看热闹中的

另外一个个子不高，但很壮的中年人看不下去了。他走进球场，到了那个欧洲孩子面前，给了他一拳。那个欧洲孩子没敢还手，和另外的几个孩子怏怏而去。在五十年代里，来中国的欧洲旅游者恐怕是绝无仅有，那些带着家属来中国的恐怕都是在中国工作或访问的苏联人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那个时期苏联人被奉若神明，得罪了他们，甚至说他们一句坏话就会招致大祸。在那群看热闹的人里一定有便衣，所以我很替那个打抱不平的中年人担心。

清华大学那时空地，树木很多，整个校园像一个大公园，但和我所熟悉的北京市内的公园又不一样。城里的公园主要都是亭台楼阁，是一种人造美，而清华的校园则是一种由空地，树木，湖泊，及一些不多的建筑所构成的自然美。校园里的空气也特别新鲜。对一个从城里来的孩子来讲，中源表哥给我带到了大自然当中，带到了一个对我来说全新的世界。

在九岁去清华时，跟着表哥第一次在清华老游泳池游泳。我不知天高地厚，一下就跳入水中。在水里，连闭眼憋气这些基本常识都不知道，睁着眼，大口喝水。那次的经历让我领教了水的厉害，给我吓得够呛。从那次后，都是中源表哥带着我游，不是他拉着我，就是背着我。因为有所依赖，我好久都学不会游泳。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在清华学会了漂浮等基本技术。

有时候，中源表哥也带着我去颐和园游泳。我们都是在傍晚去。那时公园里人很少，在夕阳下，昆明湖的风景特别好。后来到了五年级，在六月初的一天，天还不太热，我和小学同学徐穆第一次去朝阳门外的工人体育馆游泳池游泳。为了省钱，我们是走着去的。一路上还碰到沙尘暴，一度风很大，天全都是黄的。我还记得在朝外大街上经过一些老式的店铺和东岳庙。因为天气不佳，游泳池的人很少，但水很干净，也很凉。我们两个都不会游泳，只好自顾自。可能是因为有些在清华游泳的训练，也因为没有了依赖，我一下就学会了游泳，虽然那天因沙尘暴非常冷。

我还记得有时候跟着中源表哥和他的一些朋友去一个纪念碑附近玩拳击。我们还去打过一次网球，在校园里一个旧网球场。网球在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被禁或起码被忽略，好像是因为它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那个网球场周围的护网都早已不见了，所以我记得我们要跑到很远去捡球。

我家在文革前是住在一处王府井附近的四合院，是单位的宿舍。我家用院子

里的东房，西房，和北房。大约在文革中的1967年夏，单位里要我们将西房清出来，让给别的人家住。在搬家中，北院里的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来捣乱，我就和他打了一架。那个孩子本来和我关系很好，文革里，可能是受到当时的仇恨教育的影响，跟我翻了脸。打完后，那个孩子觉得吃了亏，就找来一帮人憋着找我打架。于是我父母就送我到清华避难，在二姨妈家住了一个多星期。这次避难的一个多星期成了一个特别好的假期。中源表哥带着我到处玩，特别开心。印象深刻是在晚上去西山骑自行车。那时西山那边的路很多没有路灯，到了晚上特别黑，而且路上车辆行人稀少。有时候中源表哥突然加速，在黑暗中失去了踪影。我一个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黑暗中骑行，还真有点害怕。但我太喜欢和中源表哥玩了，再害怕，也都认了。

我受中源表哥影响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滑冰。我第一次滑冰是在大约十岁时的一个冬天，有一次去外公，外婆家里玩。正值大表哥徐炎，表姐孙明其等几个人要去北海公园滑冰。我也要跟着去，但没有冰鞋，于是大姨夫将他的一双冰鞋找了出来，让我用。那双鞋的冰刀和一般冰鞋不太一样，刀刃很宽，且不高，对初学者很有利。我记得刚开始是推着冰车滑，但很快就开始空手滑了。



后来，中源表哥经常带我去滑冰。在1964年暑假里，他还把我领到什刹海体校，让我在他的好朋友兼队友赵霞当教练的速度滑冰训练班里训练了一个暑假。那时还没有室内冰场，夏天里只能是旱地训练，包括滑冰动作和体能训练。因为我是新去的，从小也没有过什么体育训练，身上没有什么肌肉，班里的队友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肉松”。体能训练包括跑步和基本动作训练，大多在北海，景山两个公园里。对我一个从没受过（1976年或77年3月，昆明湖）任何体育训练的人来说，运动量非常大，非常累。我记得用滑冰动作爬景山，上下好几次。我在内蒙时开始打冰球，后就痴迷于此。

冰球是一项团队运动，必须有一帮人一块玩。非常幸运，我周围也有一帮同学，朋友喜欢打冰球。我滑冰最上瘾是在1975年冬天。那时，我刚从内蒙会来，

在家里等着分配工作，除了学英文和拉手风琴外，没干别的，就是打冰球。当时文革进入晚期，很多青年人上山下乡回城后也和我一样，在家没有工作。这对国家，个人绝对不是好事，但对我玩冰球来说，总有一帮人随叫随到，一块玩，实在是天赐良机。其中刘文森和我最为投入。我家的远亲夏炎，夏昆兄弟俩也基本上每次必到。还有些圈内的人对体育本来不是十分投入，但由于我总是拉着他们，所以也跟着玩，像赵伦，我弟弟永和。也有的朋友不玩冰球，但滑冰，所以也一块在冰上混，像杜亚风。

玩冰球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设备。当时一双冰球鞋要六十多块，价钱绝对不菲。除此外，还起码要有球杆。因冰球运动剧烈，速度快，有时还会有身体碰撞，几乎身体的所有部位都需要保护。但在七十年代，即使是有钱，也没地方买那些冰球护具。中源表哥经常给我们一些设备，像冰球杆，护腿等等。我们自己还想办法买了冰球头盔。在当时，我们的家活应该也算是不错的了。

当然，玩冰球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有冰。那时基本没有室内冰场，冰只能靠老天所赐。好在当时气候还没有变暖。北京大概是十二月中冻冰，二月中开始化冰，其中只有六十天左右可以滑冰，所以每一天都很宝贵。滑冰的地点就是北京的公园，像北海，颐和园，玉渊潭，紫竹院等。北海有一滑冰场，其他的公园没有，就是滑野冰。滑野冰的问题是冰面没人保养，很脏。在土很多的冰上滑，冰刀刃很快就磨钝了，所以每天都要磨冰刀。那时白天滑冰，傍晚回家吃过饭后，就要马上用手磨冰刀，之后就要睡觉了。所以每天都在滑冰，磨刀，和睡觉的循环中度过。

记得在1975年十二月中的一天，我们正在不耐烦地等待着北京的湖面结冰，忽然听说北海上面已经已有人滑冰了，非常兴奋，马上骑车前往。我和好友刘文森到了北海从南门进去，果然可以远远看到在湖北岸的五龙亭附近，有人在滑冰，但我们所在的琼岛附近的冰上没人滑，冰的情况不明。在犹豫一下后，我们决定下冰试试。不想我一上冰，冰就垮了，让我掉进湖里。幸亏那时文森还在岸上，把球杆递给我，把我拉上了岸。之后当然只有赶快回家换衣服。从北海到我的月坛北街的家，骑自行车起码要二十分钟。在寒风中，穿着精湿的衣服骑车，给我冻得够呛。在1978年秋天，我在几乎同一地点又掉入北海，我在一篇名为“上学”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描写。

1980年到美国后，我继续我的体育爱好。我一直滑冰，偶尔也玩冰球，特别是在耶鲁上学时。想不到，我自己也成了美国学校体育传统的一部分。后来也开始骑山地车，滑旱冰等。总之，体育成了我一生的爱好。

还有一件受到中源表哥影响到事就是音乐。中源表哥一直喜欢弹吉他和唱俄国歌，到现在也还是这样。我在我的英文老师，周伯伯，周妈妈那里也受到了一些音乐的熏陶（我在本书里“学英文”的篇章中曾提到这一经历）。我倒没有跟着中源表哥弹吉他，但从1971年开始在内蒙拉手风琴。我记得在1972年第一次从内蒙回京探亲时，中源表哥带我去另一清华子弟马迅（清华体育教授马约翰之孙）那里，听他拉手风琴。那天，马迅拉的曲子是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那是我第一次听这个曲子，觉得特别好听，使我印象深刻。我现在不但拉手风琴，也弹弹钢琴。还经常弹这个曲子。

那时，在十六公寓和清华院墙之间有一块空地，晚上有时在那块空地是放电影，银幕正好对着二姨妈的家的窗户。有时中源表哥有事出去，我就在家看电影。我记得在那看过一个叫“山间铃响马帮来”的电影。

在文革中，大学和机关的知识分子都要被下放到所谓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清华的五七干校设在江西的鲤鱼洲。中源表哥在大约1964年高中毕业，但没有考入大学，后来就在清华工作，所以也被派了去。鲤鱼洲那个地方血吸虫严重泛滥，连劳改农场都因此而搬走了。大量清华老师和职工在那里染血吸虫病，成了他们的终生之患。将中国这么多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迫害致病，这是文革的又一桩极大罪恶。不幸的是，我的中源表哥也在其中。他本是冰球运动健将，身体极好。但血吸虫进入他的肝脏，造成肝脏功能衰退，硬化等种种病变，将他的身体全毁了，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2022年2月8日

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

【访谈】

赵东辉口述：我没当上红卫兵

季焜 采访 整理

受访人：赵东辉，北京师大二附中，初三四班

方 式：电话、微信

时 间：2016-2022年

文革中工作组一进校我就进革委会了，我也不知道谁定的我当革委会的，我不是干部。我也没贴大字报什么的，文革中我一张大字报也没写过，一指头没动过 可能是因为我是团员。初三没几个团员，我们班男生我是第一个，有两个女生，我第三个，书记是刘秀荣。

革委会的一年级一个，初三的不止一个。革委会有贾延燕、李妮妮、李瓦林，刘炳琪管保卫的，组织是谁，宣传是江洁。我是宣传组的，一共四个人，江洁、袁纯纯、我，还有初三五班的一个男生，名字我忘了。我和贾延燕没有过接触，上学时我对贾延燕印象不错，感觉他挺朴实，听说他每年假期都回农村参加劳动。可是一开始他当革委会主任，我也纳闷，他怎么能当？

二附中红卫兵是怎么成立的？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看红卫兵头全都是革委会的，我要参加也是头儿了。二附中红卫兵一开始基本在北京市是最早的，弄不好是最早的。红卫兵成立，我认为是为了不大权旁落，才成立的。工作组要撤，贾延燕他们觉得权要落到谁手里？想轰工作组，立马成立红卫兵，接手革委会职能。

他们消息特灵，头一天还说工作组好呢，第二天，贾延燕和八中等干部子弟通着消息，估计早晚差不了一两天，知道工作组不行了，马上想到革委会大权要抓过来，才成立的红卫兵。原来跟着工作组干，突然一夜之间翻个过来，我都不知道一夜之间为什么突然反工作组，我还放着刘少奇讲话录音呢，工作组布置的。我当时正放的刘少奇讲话录音，北京市革委会派工作组开一大会，咱们学校录的音，附近七中、安德路中学没有，我给他们放呢。

我记得那天好像是周六，通知我上午开会，也没说几点。快十点我去了，没人，我出来了，在操场上转。那边正贴对联呢，宿舍楼上已经贴好了。高一三的杨乃铎问我“你怎么看？”我说我不同意，党的政策出身不能选择，重在表现。我们俩在体操台探讨，聊快中午了，赶紧去开会，屋里已经没人了，人家可能已经开完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到学校，就看见白××戴着红领巾，看见江J正指挥挂标语，大条幅从四楼挂下来“打倒工作组”“工作组滚出去”署名“红卫兵”。这些个，肯定是昨天下午晚上实施的。我问：“红卫兵是谁呀？”江J说：“我们昨天成立的组织，反工作组的。你参加不参加？”我说“我参加呀。”“那你写个申请书吧。”让写完交给刘BQ。我就写了交上去了。过了五六天我想起来这事，怎么没动静呀？我们班一红卫兵说“你这叫什么申请书啊！”他还真给我拿回来了，给偷回来的。现在翻不着了。

我在申请书上提了五条意见：我特看不惯穿军装，戴红领巾，我们工农子弟上哪弄军装去？感觉不好。忒张扬。工农革命老一辈不讲究打扮。这是第一条。二，红卫兵把团组织撤了，红卫兵一成立，弄一牌子：开除全体团员，要当得红卫兵批。我特反感。还有，不让出身不好的同学吃食堂住宿舍，不对。共五条。对，我意见书上还写有：“在别人大字报上乱写乱画，还撕。”交上去，他们没理我。

红卫兵我没当上。他们不要我。

记得欢迎哪国元首，邓丹枫和张桂芬，老光着脚，张桂芬跟邓丹枫学，被打成学生反革命，不让他们去。我为他们抱不平，也没让我去。我非要去，红卫兵就拦着，我就非走，一直走到西四。我为他们鸣不平。

我出身工人，见不公平的事就得说，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文革前搞体育，好踢球，学校初中的都认识我，红卫兵不敢把我怎么着。有一天看见初二一班还是二班，正批班里女生，让人站教室前头，我看见了，制止了。我绕进去，说“散了吧。”他们也没怎么我，就散了。我好踢球，都认识，工农出身，不怕。那是8.25之前。

有一次看见操场上体操器械屋里，破四旧，我听见屋里有人喊，一扒门缝，看见一女的，她说：“同学，我不是流氓！”她被剃了阴阳头。红卫兵破四旧，把她关起来。她写了个字条，我给了刘BQ，我是革委会的，跟他熟，他不能把我

怎么样。我说：“你们干吗！把人放了吧。”后来不知怎么样了，后来没见这个人了。

8.25以后我加入红旗，于芳民碰上我说加入红旗吧，我才入的。红卫兵不要我。8.25以后学校没多少事，也天天去。一天在家门口乘凉，于芳民左建平碰上，聊起来，说红旗写大字报，红卫兵撕了。感觉想法一致，就参加了。

红旗什么时候成立？记不清楚了。最初九人小组：赵路路，郭振，曹新书，李南生，王文德，钟山，许振德，张园园。几个人凑一起写写大字报，也没成立大会。

红旗一直在图书馆小院，8.25时候就叫红旗。观点不同，都是红五类，也敢发表意见。郭振他就是，大字报敢写，贴出来。有人写了不敢贴，也有人贴出来只署名“红旗战士”，红卫兵撕的少，都是在大字报上胡批，折腾的主要是初二初三的，多数人跟着吵吵。红旗后来还有牛志民，许建中他们。张桂芬也入红旗了。邓丹枫没有参加，但观点一样，他还去过张园园家。

写文章怀念张园园。我觉得应该。红旗一开始都是她领导的。姜培良死了，是当年还是第二年，时间我忘了。张研，我，还有老牛，我们三四个人去他们家，别的人记不清了，去他家慰问。带一小花圈。看见他大儿子，没见到他小女儿，没见到他们母亲。

后来也没怎么见过张圆圆，他们没老在学校。红旗后来牛志民负责多一点。

8·25之前公开反对红卫兵跟他们辩论对联的，还有三胡一白。

东方红挺早的，他们人少。有王骥，初三6的，原来我们班的，转到6班。他们在小楼，老师办公室，大食堂东南角小楼，办公室，有几个教室，东方红占了一个地方。遵义也还比较早。遵义好像在宿舍楼。我还有照片，在香山，和王贝他们碰上了。照片多半是黄晓东照的，高三一的。当时红卫兵不在学校待着，联动后来不得势了，就不明显了。

咱对文革不知怎么回事，观望。哪经历过这个呀！慢慢地才有点认识。年轻，认识问题受党教育那么多年，应当分析当时背景，社会情况。

打死樊西曼那天我不在学校，第二天知道昨天打死了好几个人。我看见靳正宇的胳膊在操场上扔来扔去，小孩扔的，踢着玩儿。

我们班有几个红卫兵，之间关系一般还行。他们在外面折腾，抄97号院，

记得他们弄了辆大摩托车，我们班刘小平等好闹的，骑到南口兜风，坏在外面了，劳改队的拿平板车拉回来的。

红卫兵抄了好多钱，在红卫兵总部数，我跟他们有来往，关系不错。就看见钱从八仙桌上往下流，他们整理。97号院的钱成箱，铁盒子，回来上交了。我觉得绝大多数红卫兵这方面还可以（不贪钱）。那阵子谁敢呀！比较单纯，社会风气不至于，一毛钱拿了都是不对。❶

【述往】

六年芝麻官（四）

——一个县委书记的实践与感悟

李 辅

二十六、平遥并不陌生

1958年冬，我在山西农学院专科部读书时，到太谷县侯村公社井神村开门办学。当时学校提出要向老农学习，拜劳模为师。决定派我和王伟英同学，去搞调查研究。先到太谷许濮学习果树栽培技术。后到汾阳郝家庄向老劳模王厚富求教核桃种植经验。我们去岳壁村，曾坐在菜农的热炕上攀谈，倾听种菜的丰富的实践经验。最后，到平遥岳壁拜访菜农，学习蔬菜栽培技术。平遥招待所，我们住过。平遥大街我们逛过。宽宽的街道，齐整的商店，留给我美好的印象。那年，康生到山西，不知去过平遥没有，大街上不少商店房檐下挂着康生书写的“共产主义万岁！”的大字横幅，似乎说明，平遥为“进入共产主义”也曾努力跑步。

我们从平遥县城步走到岳壁，沿路看见几座圆形砧塔，在平展的土地上特别显眼。孤塔耸立，无寺无庙，不知何意？后来问明是为僧侣圆寂后专放骨灰的灵塔。现在平遥高速路出入口的迎宾路中间绿化带还保有高大的灵塔。它告知来客平遥昔日的繁荣富裕，也印证平遥过去兴盛的佛教文化。

1960年冬，我在省委党校学习，在下乡参加“五个月夺权”运动之前，省委王谦书记作的动员报告，点了平遥县委书记任井夫，58年刮了浮夸风，粮食

库存亏空，全县国库存粮只剩五万斤，弄不好要饿死人。省委撤了任书记的职。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陈永贵去平遥制造事端，被困平遥，军队驰援，杨承孝带绝死纵队攻打平遥，发生了震惊全省的八九事件。平遥受压一方不服，大标语贴满五一广场主席台两侧大型标语牌。1977年8月，平遥遭受洪灾，冲坏公路，冲垮城墙。到平遥之前，在《山西日报》看到过介绍黎基先进事迹“鸡毛蒜皮飞上天”的文章。总之，平遥是个不平静，常出新闻的地方。在我脑子里装有不少故事的地方。

改革开放后，安徽小岗村创造了大包干经验，凤阳农村很快改变了面貌。山西穷县闻喜在全省最早学习小岗村经验，发生了显著变化。我在襄汾常常听到农民、干部对大包干的争论，我有农民的经历，拥护大包干；又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坚持公社化。两条道路，莫衷一是。1980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吴象写的长篇论文《阳关道与独木桥》，以大量事实与数据，论证了实行包产到户的历史必然性和它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看了吴象的文章，豁然开朗，知道了农村发展的方向，手里有了搞好农村工作的武器。可以说，到平遥是有备而来，胸有成竹。

二十七、选举县长的风波

1981年9月29日，平遥县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中断了16年的人代会，能重新召开，是拨乱反正的成果，是把《宪法》规定的人民的权利重新交还人民的象征。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选举人大常委会和县政府领导班子。

我刚去平遥，不是人大代表，开始并未参加人代会的工作。可能是县委书记任清海同志和筹备人代会的同志听到了社会的传言，代表们中的许多人不赞成地委提名的县长候选人郭景德。县委常委于九月三十日开了半天会，专门分析研究讨论会议的动向，统一思想，要求依靠党组织保证地委选举安排的实现。晚上，专门召开了代表大会全体党员大会，任清海同志让我在会上讲话，号召党员坚持党性，消除派性，不要搞小动作，搞秘密串联，要保证选举的成功。

这次讲话本不应由我出面，一不是代表，二又是刚来，情况了解得不多。但是任清海盛情邀我，他自己觉得有了困难，说服不了大家。没有办法，党的工作，同志有难处，不能见难不帮。我经过准备，针对分析到的一些思想和动向，进行

说服教育。第一次登台讲演，说理充分，身教言教，震动很大，打乱了一派的阵脚。我在日记中祝福会议“但愿成功，平遥从此稳定下来，使人民安心下来，休养生息。”

10月1日正式选举，决定会议的成败。计票结束，结果地委提名的县长候选人郭景德，和代表秘密串联选举的侯开鉴都没有过半数，选举县长宣告失败。地委联络员立即报告地委，行署派牛专员了解情况后，让我和牛专员一起去省委组织部汇报。我和牛专员星夜兼程，到了晚上十点多赶到省委组织部，汇报了情况，他们也没有办法。又让给省人大汇报，省人大主任阮泊生听到选举失败的消息后，问县人代会结束了没有？我们告诉选举失败后，全部议程已经完毕，已经宣布散会了。阮主任遗憾地说，要是未宣布散会还可以继续做工作，挽回局面。要是散会了，那就不行了，只能承认现在的结果。结果是平遥县政府成立了，却没有县长。还让郭景德担任县政府党组书记，主持政府的工作。这已名不正，言不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了。郭景德受到了沉重打击，已心灰意冷，无法恋战了。

为什么选县长失败？平遥老百姓秘密推举的是他们眼中的英雄：老干部、平遥火柴厂厂长侯开鉴。老侯解放前参加革命，在平遥火柴厂工作多年，很有威信。特别是在清查“四人帮”时，被打成“谢振华的黑干将”“反大寨的急先锋”，抓起来，关进监狱。在全县批斗侯开鉴时，他凛然正气，威武不屈，拒不承认“错误”。广大干部、群众都认为侯开鉴“硬骨头”是条汉子，能代表他们。在选举前早已秘密商量，细致地给每一个代表做工作，并进行统计，很有把握，把侯开鉴选上县长。是我的讲话，动摇了一部分代表的决心，导致侯开鉴未过半数，否则老侯就当上平遥县长了。

通过这次选举，我又一次深刻认识了平遥人。文革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陈永贵打成“反革命”，一直没有屈服，坚持斗争。这次选举是那樣的执着、坚定。本来老侯的名字中的那个“鉴”字很复杂、难写（现印的鉴，是简化字，繁体字电脑里没有）。串联的人一笔一画教会农民代表，怕写错字成了废票。计票时，竟然没有因为“鉴”字写错出现一张废票。难啊，你不得不佩服平遥人。

这是一场风波，党委提名的人落选，在全省开创了先例。这一教训，党组织本应认真总结，县长由人民代表选举，为什么不尊重民意呢？党委提名县长候选人，往往从党的利益和干部政策来考虑，有时个别领导还塞个私货，搞个裙带，

后来情况更为严重，像百姓说的那样：“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常常违背民意。而人民选择县长，一看他是不是好人，二看他能不能为老百姓办事，既重德又重才，这有什么不好！

每次选举，党委提名的候选人要当作政治任务保证完成。人代会的临时党组要动员党员坚决执行上级党委的安排，保证党的意志的实现。至于绝大多数人民想选谁并不关心。党委包办代替，说是代表人民利益，实际上是剥夺了人民的权力。为啥县级选举不敢放开，到底怕啥？我们常讲相信群众，为啥一到具体问题就把群众抛到一边？

中央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由于提名候选人并不重视民意，所以，多数选民也不相信和关心这一制度。选区选举代表，投票率极低，有时不得不发礼品，吸引选民到场投票。我国的选举制度，形式上是民主选举，实际上选民没有选择权，选人民代表，是党组织提名。人民代表选举的政权机构领导人，更得党组织提名，上级党组织批准，选举是人民代表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搞形式走过场，人们编顺口溜讥讽“人民代表是吃馒头，举拳头”“人代会是举手，政协是拍手”。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人民代表”也进入市场，许多老板把人民代表当作“护身符”，不惜重金购买，贿选成风。有人说，这也是一种进步，打破了权力垄断。也有人说，是中产阶级开始觉醒，知道利益诉求和自身保护。这些都不正常，选举制度应该及早顺应民意，进行改革了。

二十八、工作起步，调查研究

我是三中全会路线的受益者，也是这条路线的忠实拥护者。当省委决定让我到平遥工作，我真想按照三中全会的路线大干一番。



我知道平遥穷，情况复杂，难干。但我没有丝毫畏惧，相信有好的路线和政策，只要实干，把群众带动起来，一定会改变平遥的面貌。

平遥在山西是有名的老大难。去平遥后听到这样一首

民谣叫“城内十大怪”：“油路修好又刨坏，好货都在后门卖，电话没有走得快，吃水跑到南门外，马路中间把粮晒，汽车专门拉小麦，群众经常吃烂菜，猪在街上耍无赖，专为书记把房盖，谁提意见谁受害”。群众的怨言反映了一些落后和腐败现象，到底怎样认识平遥？首先搞调查研究。我们三个副书记，到王家庄、洪善、襄垣、朱坑、南政等几个公社调查了解情况，认识平遥。和公社书记杨荣海、孟宪杰、李逢达等了解情况，商谈工作，觉得他们都很有水平，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基层工作经验。

岳壁公社黎基村的调查，给我们极大的启示。这是多年的老先进大队，老支部书记赵普润，曾因工作突出，提拔为县委副书记。黎基，人多地少，人均不到一亩地。但是靠发展村办工业，“鸡毛蒜皮”飞上天。用鸡毛做掸子，有限的土地种特产大蒜，用别的地方加工兔皮的下脚料兔头皮、四个爪子剥下的皮，整合在一起，加工皮手套，还建起队办小水泥厂。继任大队支部书记安广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黎基建设成为全县著名的富裕村。

我们来平遥之前，郭兰英回家乡演出，并指导县青年晋剧团。她走后不久，青年晋剧团在全省晋剧会演中，夺得一等演员奖一个，二等演员奖三个，载誉而归。短短时间的接触，深感平遥确有人才。

但是平遥40万人口只有80万亩土地，社会生产总值只有8千万，人均产值才200元。财政连年赤字，确实穷。我在当时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平遥又穷，又有人才，似乎不统一。其实一个“左”字把它们联结在一起了。只要纠正左的错误，人才可以把“穷”治住，让“富”在平遥扎根。

经过调查，我当时确定的工作方针是：恢复元气，鼓舞士气。把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工作肯定会上去！

平遥有辉煌过去，富裕的历史。1823年左右，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及其横跨北方共同市场的信用网络在平遥就诞生了。票号的诞生标志着晋商由商人资本向信用资本的过渡，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达到了它的历史顶峰。平遥曾经引领过历史潮流，登攀过富裕的制高点。郭兰英唱的民歌有两段：“山西的特产数不尽，数来数去数晋中，晋中哪儿最有名？哪儿哩？还数俺们平遥城。平遥的牛肉太谷的饼，清徐的葡萄甜盈盈，晋中哪儿最有名？还是数俺平遥城。”

恢复了平遥人民的这种自豪感，树立起自信心，艰苦实干几年，平遥一定会

复兴。

二十九、霍士廉书记支持我

霍士廉生于山西忻州北堡村一个农民家庭。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接受革命思想，1930年在忻州中学参与组织革命青年团。1931年他组织发动了反对反动校长和捣毁国民党县党部的斗争。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2月任中共陕西富县县委书记，1937年11月任中共陕甘宁边（特）区委员会秘书长。1938年5月受党中央派遣由延安赴山东参加开辟建立抗日根据地工作。他在山东工作了11年，解放后在浙江工作了16年。1965年到西北局。文革结束后，从宁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调到农业部。

1980年10月，霍士廉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他不顾年过七旬的高龄，即赴山西开展工作。他团结和带领省委一班人，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中央的整体部署和中央对山西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贯彻拨乱反正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理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各方面关系，妥善处理了许多复杂的思想问题和社会政治矛盾，纠正了历次政治运动中遗留下来的一大批冤假错案，有力地促进了山西省安定团结局面的形成，为动员全省人民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花大力气抓农村改革，几乎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地、市、县，进行调查研究、组织引导，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在全省推开。在此基础上，他积极引导和支持专业户、专业村的发展，使全省农村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他还特别重视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尤其爱护年轻干部，关心年轻干部的锻炼与成长，大胆破格提拔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担任省、地、县各级重要领导职务，使全省领导班子建设向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他作风深入，工作扎实。在任期间，为山西全面发展提出了科学思路，采取了有效措施，使山西的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良好局面。

我正是得到霍士廉同志特别关心的一个干部。

霍士廉到山西工作以后，抓紧为清查中的冤、假错案平反。1980年冬，霍士廉到襄汾县调查研究，许多干部、群众到县招待所找霍书记，要求省委为李辅尽快平反，要求李辅重回襄汾工作。去的人很多，无法一个一个地接谈，霍书记

让各行业派代表召开一个座谈会，由省委副秘书长张长珍主持召开，听取了广大干群的意见。会后张长珍给霍书记汇报，霍书记听了后说：“还有这样好的干部啊！”他回到临汾问地委书记董启民、专员续恩岚“李辅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回答说：“没问题”。霍书记说：“没问题，就赶快给平反”。后来霍书记又亲自问王谦，李辅有什么问题？王谦也说没问题。经过霍书记的督促，临汾地委于1981年3月16日向省委转报襄汾县委为我平反的请示报告，请求省委为我平反。山西省委于4月14日正式批复了临汾地委为我平反的请示报告。

1981年4月省委给我平反后，未能及时工作。省委有的领导同志想让我重回省委调研室工作，有的省委领导坚决反对，说到调研室当干事都不行。霍士廉同志认为对待李辅的问题，是一个政策问题。如何看待文革中犯过“错误”的青年干部，李辅是个风向标，不是一个人而是涉及一代人。霍、罗书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路线，没有就事论事，个案解决。

1981年5月霍士廉、罗贵波在向中央汇报工作时，专门汇报了我的情况。说李辅文革初期造过反，较早觉悟，没干过坏事，也没打砸抢，以后每到一个地方，都表现很好，受到群众的赞扬，像这样的干部该怎么办？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习仲勋、宋任穷等同志表态说：“像李辅同志这样，仍要作为党的优秀青年干部来培养”。霍、罗有了中央书记处的明确指示，省委常委会再次讨论，同意分配我继续到县上工作。

最初，决定让我到寿阳县当书记。平遥的书记任清海同志有胃病，不能吃平遥的红面、玉米面等粗粮，不安心在晋中，要求调动。他找霍书记时，霍书记觉得平遥是个大县，比较复杂，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任清海就推荐我到平遥接任他的书记职位。后经常委研究，决定让我去平遥任县委第一副书记，过渡一段再任书记。霍士廉同志找我谈话，说你还年轻，在基层再锻炼一二年吧！又问我多大年龄啦，我说42岁。霍书记说42也不小了，先到平遥工作，以后回省委调研室也行，回农工部也可以。霍书记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青年干部一副热心肠。

有一个人，曾在平遥当过县委副书记，整人害人，疯狂至极。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时，被免除了职务，到山西大学当了教师。知道我到平遥工作，怀恨在心，捏造事实，给中央写信告我的黑状。中央把信转到省委，霍士廉同志看后，

觉得是一个新的动向。1981年11月15日，霍书记就专程到平遥，召集四大班子成员开会，先是听取县委工作汇报，在汇报的过程中霍士廉又讲到，对我做了大量的调查，今年五月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时，又把李辅的情况专门向书记处做了汇报。霍士廉说：李辅是个好同志，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习仲勋、宋任穷和中组部赵正清副部长说，像这样的同志要作为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培养。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

当时，我在省委党校学习，开会时没能参加，会后通知我专程回到平遥。霍书记又找任清海和我谈话，说明他来平遥的背景和目的，特别指出“在派性严重的地方要多调查、少表态、少说话。工作胆子要大，不要怕”。省委领导的关心、支持，使我十分感动。当时，我写下了这样的话语：“中央，省委对我这样关怀，我一定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深刻记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彻底清除‘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增强党性，根除派性，为党好好工作，为人民多谋利益，报答党中央、省委的恩情，尽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可以说，没有霍书记的关心，我的冤案不会很快平反。没有霍书记的爱护，我不会被重新重用。没有霍书记的支持，我也到不了平遥，站稳脚跟。霍书记在位，我不会再次受害挨整。前后变化，教育我明白了究竟谁是党？霍书记和我没有任何私情，他不顾李立功、赵雨亭的造谣污蔑、诋毁攻击，敢于坚持正义，完全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坦白胸怀和高风亮节的显现，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完全是为了党的事业。我怀念霍书记，向他学习，向他致敬！

三十、逆耳忠言虚心听

1981年地委调整平遥县领导班子，同时调去五个人，除我之外，另有罗长庚、李富荣两个副书记，还有两个副县长：贾传德、刘运轮。我们五个人都在大灶吃饭。此前县委书记任清海也是在大灶吃饭，为了不让他排队，在灶房设了一个饭桌。任清海是晋南曲沃人，吃白面长大的，吃不了粗粮，更吃不了红面搅榆皮面的擦圪斗。食堂照顾他吃白面，这引起一些干部职工的不满，认为是搞特殊化。贾传德、刘运轮先我们早去几天，照任清海的办法，就在灶房内吃饭，我们后去的三个也跟着他们一起吃饭，谁也没有搞特殊，和食堂就餐的人一起吃粗粮。

没过几天，我接到一封信，信中说，你来平遥，群众寄予很大希望。希望

你不要搞特殊，脱离群众，群众对你们在灶房吃小灶很有意见，盼你能尽快改正。写信人是常学温。看了信后我有点不高兴，社会传说平遥人刁，自认为刚来平遥就遇上了刁人。我打听常学温是个什么人？为啥不顾事实，说我搞特殊？打听后获知，常学温是统计局的一个干部，是个老干部，是57年被打成右派，平反后分配到统计局工作的。此人性格耿直，看不惯歪风邪气。我想这是一场误会。他不知道我们和大家吃的是一样的饭菜，以为在灶房内搞特殊。给我写信完全是善意。

新的政府机构成立，县委和政府要分开办公。政府街南侧原县二招，已经修缮完毕，县委就迁到那里。一天，常学温同志找到我，毛遂自荐，要当县委食堂的管理员。他批评县政府食堂办得不好，跑冒滴漏，克扣职工，群众普遍不满。他表示保证把县委食堂办好，让广大职工满意。从我的了解和接触，我认为老常是个诚实可信的人，就与办公室商量，同意将老常从统计局调到县委专管食堂。果然，老常把食堂办得很好，馒头比政府那边大，菜比政府那边质好价廉，县委上灶的干部异口同声，皆都叫好。后来才知道，老常根本不懂会计，不会算账，就是靠两袖清风，把食堂搞好了。老常听到了赞歌，在平遥改革的大潮中算一个插曲。

从这一插曲中，我发现了一个人才。常学温早年参加抗日战争，浴血奋战，出生入死，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彭绍辉的机要秘书，后任机要科长。1955年西北军区推荐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深造。在党史四班，与著名作家苏叔阳、从华东军区入校的丁延年同班。丁延年哥哥是国民党师长。丁延年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投身革命。到了人大，担任党史系总支书记。1957年，他提出建议，我国应尽早制定刑法和民法，认为这是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法律，这被认为反党言论，打成“右派”。常学温是党史系总支副书记，在批判丁延年时，本应是党小组长发言，组长有病，由副书记常学温代表两人发言批判。常在发言中称丁延年为同志，说丁有错误，但不是反党言论。提出制定刑法、民法是正确的。更不应打成“右派”。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胡锡奎（曾任西北局书记），递给常学温一个纸条，问你和丁延年是什么关系？常学温在发言中回答说：我和丁延年有四种关系：都是来自部队，是战友关系；都是党的基层组织领导，是组织关系；都是共产党

员，是同志关系；都是人大学生，是同学关系。除此而外，没有别的关系。如果组织认为还有什么关系，由组织决定。就因为这个发言，把常学温也打成“右派”。

毛主席当时决定，大学生中的“右派”“收党票，给粮票”，组织决定把他下放农村改造。常学温说，我就是农村出来的，不要下放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回自己的家乡吧。在回农村前为了不再株连妻子，又劝说妻子和他离了婚。常学温回到农村，扑倒身子，脏活累活都干，和乡亲们同甘共苦，血肉相亲，得到广大村民的支持，又赢得一个农村姑娘的芳心，重新组织了家庭。他无怨无悔在农村一直干了十几年，直到1979年平反。常学温早就是我党培养的人才，只是不会看风使舵，出卖良心，被政治运动毁坏成了废材。

三十一、先抓班子，配齐队伍

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查，知道平遥人多地少，资源贫乏，折腾的时间较长，好多好干部被打击迫害，没能发挥聪明才智，积极性受到了压制。任清华同志没有在平遥长期工作的打算，也不愿惹人，一直凑合着干。直到我们去后，还有11个公社班子处于瘫痪状态。尽管霍书记曾说过在下面再锻炼两年，还回省委工作。我是喜欢干实际工作，不想在机关当官。我是下决心在平遥要干出个样子，不解决干部问题，谁来工作？

首先，必须配齐公社班子，把有能力的、肯干工作的同志放到重要岗位上。

李光荣原是仁义公社党委书记，清查时被栽赃陷害，抓进监狱。地委已给平反，县委还未给分配工作。李光荣在仁义公社被群众誉为抓“路线”的干部，带领群众打通了山区公路，祖祖辈辈不通汽车的地方，通了汽车。多少年来仁义山上“点灯靠油”，李光荣同志把高压输电线通到了山上，老百姓点上了电灯，见到了光明。像这样的实干家，立即启用，安排到卜宜公社任党委书记。

城关公社书记和革委主任闹不团结，书记长期不上班，班子瘫痪，把王家庄书记杨荣海调到城关担任书记。香乐公社一个副书记作风不好，免了职，调离公社。净化公社一个副书记和公社一个女干部乱搞，被捉奸后，裤子挂到了院内的树上，还不承认错误，影响极坏，经常委讨论开除了党籍。就这样大刀阔斧，扶正祛邪，把11个公社的班子都配好配齐了。大家看到县委在使用干部的态度，不是以派用人，而是以能力和干不干、德才标准选任干部，用人导向变了，干部

队伍的风气也跟着逐步改变。

三十二、农村改革，刻不容缓

大寨在晋中，文革期间昔阳的干部领导晋中。大寨、昔阳左的一套在晋中地区影响至深，根深蒂固，对于农村改革，很多人担惊受怕，不敢改弦更张，生怕秋后算账，再被打成“复辟资本主义”。全国许多地方农村改革，波涛汹涌，热浪滚滚，而晋中却还冷冷清清，左顾右盼，按兵不动。

平遥农村，改变贫困，解决温饱，进行改革，在此一举。

平遥县的土地，汾河区占三分之一，丘陵区占三分之一，山区占三分之一，可耕地少，水地更少。在文革期间学大寨批资本主义，不让群众搞工、副业，那么多人围着二亩贫瘠的土地上打转转，连自己的口粮都解决不了。批资本主义，越批越穷。群众辛苦一年，吃不饱肚子，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恶性循环。

1981年，平遥不少社队还吃返销粮。小岗村的经验，把土地下放，搞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余全是自己的”，广大群众肯定拥护。但干部不宣传，他们不知道。干部不放话，他们不能干。

农村必须改革，关键时刻的关键措施，必须当机立断，抓紧抓快，落到实处。关键措施要由关键人实施，必须打通关键干部的思想。

放手农村改革，我先造舆论，大力宣扬小岗村、凤阳县实行大包干一年致富的经验。并组织公社干部到小岗村、凤阳县，参观学习，探宝取经。经过宣传发动，特别是看了凤阳县的巨大变化，鲜活的事实使基层干部的思想转变了，回到本地就立即搞起了大包干。1981年冬天，在很短的时间就把百分之八十几的土地承包下去了。

土地包产到户，平遥在晋中地区是一马当先，引起了其他县的广泛议论，也引起了地委领导的不满和关注。地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胡光隆同志专程到平遥调查了解。一听说百分之八十多的土地包到了农户，非常不满，担心并指责我，“看你明年公粮怎么完成任务呀！”我说，老百姓最讲道理，只要有了粮食，他们肯定会上交公粮的。平遥农村改革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但也留下了一个秋后算账的问题，只待来年秋收后做结论了。

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晋中有些县迟迟不把土地承包给农民。深受极左破坏

的昔阳县，却另是一番风景。县委书记侯光天同志大刀阔斧搞改革，首先推动大寨改革，然后在全县推广小岗经验，取得了巨大成就。

1982年7月地委在寿阳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进一步推进土地大包干，侯光天同志和我先后介绍大包干的经验，竟然受到平定、太谷县委书记的质疑和责难。到什么时候了，还怀疑大包干，要搞专业承包。可见大寨的极左在晋中的影响多么厉害。寿阳会议没有统一了思想，各县还是各行其是，晋中原来较富的几个县，关键时期没跟上，落在了后边，可见一个县的主要领导影响一个县的进退与人民的福祉。

三十三、一炮打响振奋人心

1981年9月中旬，我到的平遥。10月中旬，任清海就让我主持县委工作。到12月中旬，省委正式通知我任平遥县委书记。

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工作实践，对于平遥的发展已经有了思路。为了动员全县人民，统一思想，把思想变成行动，我必须拿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从平遥的现实情况出发，经过反复思考，总结概括，我提出“平遥要想富，走通六条路”的口号或者说是纲领：第一，农村要普遍推广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发展奶山羊。平遥当时有了一定的养殖规模，要继续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为县奶粉厂提供充足的奶源；第三，大力抓好棉花的种植。在襄汾工作时，请吴吉昌指导棉花生产，棉花的密植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到了平遥调查时发现，平遥种植东北黑山棉，每亩上万株，有密植的习惯，这就为增产提供了条件；第四，发展社队工业；第五，抓好县办工业；第六，科技兴县。

我任县委书记后，把这些设想，分别与人大、政府、政协的同志们进行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修改和充实、完善这个纲领。

春节前，我就起草报告，准备春节后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时，向全县发布。春节上班后，我让办公室副主任李天祯把报告重新抄了一遍，让他边抄边改，后来我又进行反复的修改，三干会的主题报告，建设平遥的方案基本有了。三干会上一炮打响，“平遥要想富，走通六条路”，传遍全县，成为全县人民共同奋斗的口号。

为了营造大干快上的气氛，鼓舞全县人民的士气，扫除平遥贫穷落后的阴霾，

春节前，我就安排了元宵节的文艺活动，除去传统的民间表演以外，我询问当地有没有制作传统焰火的厂家或村落，说没有。后来，我让社队局出3000元钱，到太原烟花厂定制了焰火。

1982年正月十五晚上，平遥县城第一次燃放焰火。为了保障安全，专门把焰火燃放地放置在城外柳根河沿岸。那天晚上在街头文艺表演后，群众就涌向柳根河畔，城乡几万人观看燃放焰火。人们一张张笑脸，仰望天空，观看那五彩缤纷，光辉灿烂的礼花。在落后地区工作，打破落后沉闷的气氛，振奋人们的精神十分重要。要点燃人们的希望，鼓舞起精气神，在人们心底激发起奋发图变，努力翻身，治穷致富的愿望和决心。“平遥要想富，走通六条路”，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简明好记，口口相传很快成为全县人民致富的蓝图和行动纲领。1982年开了一个好头，平遥人民有了盼头和奔头！

三十四、依靠科技保棉丰收

公社化时期，农民重粮轻棉，山西棉花生产比较落后，满足不了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后，棉花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罗贵波省长采取多项鼓励政策，奖粮、奖钱、奖化肥，促进棉花增产。

我和科技局长、高级农艺师邢宝民研究了棉花增产的措施，除去广泛宣传省政府的优惠政策外，关键是要普及科学技术措施：第一，狠抓密植，每亩上万株，一株保两个棉桃，产量就可上了二百斤；第二，抓地膜覆盖，抗旱、增温、延长生长期。后来，发现地膜覆盖压碱，平遥有几万亩碱滩，不长庄稼，有人叫“飞机场”。推广地膜覆盖后，平遥的“飞机场”都变成了良田。第三，增施化肥，特别是磷肥。第四，加强植物保护，及时预防病虫害的发生，特别是对棉蚜的防控。第五，科技承包。邢宝民、贾凤兮等几个农科人员和田家堡大队签订了保产合同。社队保证科技人员的技术措施落实到田间，科技人员保证达到合同规定的产量。达不到受罚，超产部分，按比例提成获奖。第六，科技下乡。山西棉花研究所，和我有良好的合作历史。知道我到平遥任职。所里派植棉专家陈启恩在辛村设点示范。县里培养科技“二传手”，就是农民技术推广员。国家科技人员把技术先教给他们，由他们再推广普及到棉农。这一经验，《山西日报》曾以头版头条报道，向全省宣传推广。

1981年平遥棉花总产二百来万斤。地委主管农业的胡光隆副书记和柳成副专员，鼓励我们把棉花抓好，说1982年总产达到四百万斤，奖励人民币两万元。一言为定，我承揽了下来。1982年由于国家政策的激励，我们全面推广科学技术，全县棉花总产超过四百多万斤。行署兑现，真的奖励了我们二万元。有了这两万，我和县长罗昌庚商量决定购买一批机动喷雾器，搞一支棉花灭虫的专业队伍。

余钱给县委和政府办公室各买一台彩色电视机，改善一下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棉花增产丰收，主要是全县棉农和科技人员努力的结果。那时，获得奖金，根本没想过装自己的腰包。想的是公益，大家分享。棉花增产走出了一条新路，可持续发展，1983年棉花总产再创新高，在1982年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达到九百多万斤。全国著名植棉劳模吴吉昌，多次来平遥参观指导，赞叹不已。

三十五、古城的规划、保护与建设

襄汾无城，原来汾城和襄陵县城，都成了公社所在地，城墙早已拆毁。平遥是古城，原貌基本未改。我到平遥工作后，与襄汾对比，最突出的区别是接待任务十分繁重。山西在许多外地工作的老干部，重新工作后返乡探亲的很多。平遥离省城近，交通方便，当时有声名远播的双林寺、古城墙，又有特产美味平遥牛肉，省、地领导把参观平遥作为旅游接待的首选。国人来平遥多，外国人来平遥的也多。最多的是法国人，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对双林寺的彩塑，非常欣赏，介绍给了法国民众，法国游客最早前来平遥。过去，我在襄汾对古城保护、接待旅游是空白。来到平遥后，国内外宾客纷至沓来，必然引起我的重视，学习未知，探寻新城，深入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保护历史文物问题，越来越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多方面呼吁、反映也越来越多，党和政府也很重视，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据我所知，书记处去年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胡耀邦亲自主持了会。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这件事不仅是保护文物，而且是发展。刑法上有两条有关保护文物的条款。除国务院1961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条例，中央考虑近两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这个和森林法一个级别的国家一级法律草案，已经到了人大法制委员会，我也曾被邀参加讨论。

1982年8月17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城市保护专家郑孝燮教授和余仕康教授来平遥，对平遥古城的保护工作，进行指导，对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针对上海同济大学为平遥保护古城进行了规划，他说：“同济大学对古城保护和新区建设都做了比较好的考虑。正是有这个基础对平遥建设发展，起一个指导思想的作用，作为建设的一个蓝图。城市建设有规划的蓝图，有好的规划，是很可欢喜的事情。作为历史悠久的平遥县城，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比较来看，作为一个小城市，虽然经过十年浩劫，文物古迹保有多的还是平遥，这件事本应值得我们欢喜的一件事。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保护历史文物问题，越来越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多方面呼吁、反映也越来越多，党和政府也很重视，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

据我所知，中共书记处去年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胡耀邦亲自主持了会，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这件事不仅是保护文物，而且是发展。大同市就是历史文化名城。刑法上有两条有关保护文物的条款。除国务院1961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条例，中央考虑近二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这个法律草案，已经到了人大法制委员会，我也曾被邀参加讨论，现在未最后定案。和《森林法》是一个级别属于国家一级法案。今年四月解放军三总部发布军队要注意保护文物的法令。全国政协连续四年派出调查组调查全国文物保护的情况，把问题查找出来向中央汇报。在中国河南、陕西、山西，黄河流域是汉族文化的摇篮。党的文物保护政策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我们的认识看来得跟得上，都是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文物保护要加强，党的政策是明确的。据我所知从古建筑保护下来最多的是山西省，山西只有一个历史名城，山西古建筑比河南、陕西要多，山西再发现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希望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加入进去，希望注意这方面的工作。从平遥现有文物和各方面的条件，把同济大学吸引到这里来了。希望要在国务院批准之前，加强保护，重视这个问题。”余士康要求：“规划好，保护好，建设好，管理好。”郑先生和余先生向我介绍了世界上保护文物最好的情况，瑞士经济四大支柱之一旅游业与文物保护的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会讨论世界文化政策等。郑先生一席话，大开脑洞，提高了对古城保护的认知和自觉，也知道了办法，明确了目标。

我在太谷、祁县住过，原来县城都很好，解放后先拆城墙，后拆街道，古城

风貌荡然无存。平遥穷，没有经济实力“改造”旧城，没有大拆大建，因穷得福，把古城保留了下来。如今，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座稀世宝城保护好。1982年春节，县委提出一个口号：“人民古城人民爱，人民古城人民建”，先行宣传，让广大群众有保护古城的意识和观念。县文物所所长李有华先生，负责古城墙的维修工程。他热爱古城，对古城的保护做出了突出贡献。维修城墙，省里每年给十万元的拨款，县里拿不出钱来，就靠省里的十万，缓慢推进城墙的维修。后来，张希舜先生当了省文物局长，老朋友对我给予关照，每年维修城墙的经费增加到二十万，由此加快了进度。

平遥县城没有下水排污系统，以前几届政府也维修马路，只是在原来路面上加铺水泥或沥青，夏天铺，冬天一泼水，一冻又坏了，往返重复。我们下决心根治，先把排水排污的系统打通，然后铺路。

1982年县财政刚刚好转就筹措了48万元，首先改造西街和南街道路。开工后，我常利用饭后休息时间到工地上看看，工程挺难，也挺大，街道窄，开沟深，出土堆积在两旁，行人很难走。但是群众都纷纷叫好，并无怨言，都认为县政府干得是善事，前无古人，是为平遥造福。经过半年多的施工，地下排水工程完成，污水送到城外，终于把两条重要街道修好了。当时，平遥人民就把这件事作为功劳记在我的头上，直到现在平遥人还念道“李辅为平遥修马路”，好像是“开天辟地”一样，记入他们的心中。

1983年同济大学完成了《平遥古城保护建设规划》，规划就是法律，政府和市民都必须依法办事。县人民代表大会也通过决议，坚决制止乱拆乱建，先把破坏古城的行为刹住。政府决不搞建设性的破坏。像此前县革委拆了旧县衙大堂，新建大礼堂的蠢事不能再次发生。

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的发展完整画卷。已是中国明清古城的孤品，在专家的指导下，全县上下共同努力，1986年12月8日，平遥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再接再厉，抓住机遇，安锦才副县长和文物局李有华局，在县委领导下，做了大量细致的具体工作，1997年12月3日，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平遥古城为“世界文化遗产”，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平遥古城墙、

街道、民宅完整地保留下来，2009年，又荣膺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的殊荣。未曾想到“世界文化遗产”这块金字招牌，使平遥走向世界，平遥成为世界旅游目的地，每天有许多游客光顾。前两年国庆黄金周，日接待量最高到过十万游客，自驾车下不了高速路，进不了城。旅馆爆满，一床难求。每年举办平遥国际摄影节，在著名导演的支持下又新办平遥国际电影节，世界又走向平遥。每年回到平遥，看到平遥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兴旺，由衷的高兴，祝福平遥，祝福平遥人民！📷

【述往】

驱逐新鑫公司

——一个县人大主任为民争利的故事

张树田

引狼入室，新鑫公司染指凤台

合肥到阜阳的 206 省道从凤台过淮河，多年来过往车辆都是依靠轮船摆渡。80 年代中期市县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经过多方争取建起了凤台淮河大桥，于 1991 年 5 月 1 日通车。这座大桥成为沟通从合肥、淮南、长丰、六安、寿县等地到阜阳、蒙城、颍上、利辛、凤台等地的枢纽。由于资金短缺，当时交通部、煤炭部各投入数百万元，只占总投资 4000 多万元的一小部分。其中大部分投资由省政府批准收费偿还贷款，标准是每吨货物收取过桥费 1.5 元。

1993 年下半年，合肥新鑫公司把手伸向淮河大桥。据当时多人透露，新鑫公司老板是省委书记的秘书，具体经办的是省财政厅的工作人员尚力，省委书记儿子也参与其中。他们从交通厅到公路局，到淮南市和凤台县的领导人很快斩关夺隘，一路通过。有关部门以非常优惠的条件为他们征地拆迁，提供地皮。县政府还为他们召开了调度会，并发了会议纪要，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让他们有利可图。工程竣工时举行了剪彩仪式，副省长 WXZ、副市长杨爱光出席并讲话。我当时已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未与会。我的前任李

树义同志已退下领导岗位，他以一名普通群众的身份到了会场观察。会后他告诉我，杨爱光副市长的讲话很有意思，他只是强调参加施工的工人同志们辛苦了，对他们表示慰问，其他没讲什么。我意识到：杨爱光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这件事还可能有后戏呢！

新鑫公司做了什么事呢？竣工后看明白：一、蒙了一块遮羞布。即从淮河大桥东端起始到河东拐子集 2.63 公里的路面上覆了一层约一公分多厚的瓜籽片拌沥青。这是国有 206 省道的一小段，其路基和路面质量都是很好的，覆一层沥青对改善路况缩短路程没有任何意义，个别地方对路基做了一点修补也是可有可无。这样做就是蒙上一块遮羞布，给人以修了路的观感。二、建起一座收费站。他们不惜财力物力在拐子集跨公路修建了一座很气派的收费站。三、竖起一块大牌子。这是一块巨幅标语牌树立在收费站旁的公路北面，上面大字抄写省政府关于批准凤淮路大山段收费的文件。

这份文件我早在办公室的文件夹中仔细看过了，核心的内容是：凤台淮河大桥的过桥费收取标准由原来的每吨 1.5 元提高为 3 元；大桥西端仍由凤台县收取，东端拐子集改由新鑫公司收取。（省政府的文件写成南端和北端，把方向搞错了。）这三件事，都轻而易举地做好了，又有副省长亲自剪彩，于是他们就堂而皇之地坐地收钱了。

初步的抗争

凤台淮河大桥主要由凤台县自己筹备和领导修建，前后花了四年多时间，耗资四千多万，交通部和煤炭部也各支持了几百万，只占到总投资额的少部分，偿还贷款主要还靠收费。新鑫公司既未出钱又未出力，只是在原来 2.63 公里的国有路面上覆一层薄薄的沥青作遮羞布，对路况路程没有任何改善就设站收费，而且与过桥费等额。表面看虽然凤台县大桥管理处收费量没有减少，但通过费增加了一倍，过往车辆的花费翻了一番。大桥管理处收费用于偿还建桥贷款，而新鑫公司的收费装入了他们自己的腰包！他们做的是无本生意，赤裸裸的掠夺！

这件事立即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也成了机关干部和离退休人员议论的焦点。

某日，我到办公室翻看秘书科送来的文件夹，发现内有十几位离退休老干部

联名写的人民来信，表达了对新鑫公司无理设站收费行为的强烈不满，要求市人大常委会调查处理。署名的有郭新吉、杨泽远、齐儒卿、李树义、祝立田、孙以明……他们曾分别担任过县委书记、副书记、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常务副县长、城关镇党委书记等，又都担任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政协主席等职务，本来已经隐退现在又齐刷刷地站出来说话了。这时我感到又增加了对这些老同志的敬重，对解决这个问题增强了信心，也看到了切入点。

于是我立即拟写了批示，要求由丁祥山（原法院院长）、沙道安（原副县长）、葛文勋（原朱马店镇党委书记）三位副主任组织对来信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由于参与调研的人都在凤台工作多年，人熟、地熟，主要情况明摆着，没费多长时间就写出了调查报告。

为了进一步广泛听取意见统一认识，我在县人大会会议室主持召开了座谈会。与会人员主要是写人民来信的十几位老干部、在职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约请县委书记、县长到会。座谈会上大家纷纷表达了对新鑫公司的义愤，对争取公平正义的决心。齐儒卿同志慷慨陈词：“不行，我们就把官司打到北京去！”这位老干部头年从政协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建桥时他是常务副县长，具体领导建桥工作，他跑省、跑部，筹资金，找材料出了大力，大桥用的日产吊索钢缆就是他去找到凤台籍的原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买到的。沈绍曾担任过水利局总工程师，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位置上退休，也参与了建桥的许多工作，他在发言中气乎乎地大声说：“这凤台县出了叛徒！”。整个会议县长、县委书记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大家心知肚明，没有他们招引或许可，新鑫公司是不会入侵凤台县的！会上也有个别同志提出这是县委县政府的事，应该由他们研究处理。会上也有几位同志提出我们应该先向市里省里反映，我也表示赞成。

过了两天，我们一行十七八人乘坐县政府安排的大巴车到了淮南。我们事先取得了联系，称到市人大机关汇报工作，有几位老干部跟我们一起去。在淮南市人大机关，夏毓启主任和李世勤副主任接待了我们。听过我们的汇报后，夏主任表示这件事可以向省人大反映，因为收费是省政府批准的，市人大不好表示意见。李世勤副主任没表示明显的不同意见，但他说，省政府已经批准并下了文件，胳膊拧不过大腿，你们反映意见不知道可管劲？意思是不主张我们再到省里反映。

上级机关的领导不见得亲睹亲闻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也不见得体会到老百

姓的血汗钱被新鑫公司公开掠夺的愤怒不平，我们是急于解决这个问题。于是第二天我们这些人又一车开到省人大。接待我们的是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陆德生和财经工委主任孙杰。陆当然与我熟悉，他是位老资格，曾经当过《人民日报》记者和《红旗》杂志编辑，老省委书记曾希圣的秘书；而孙杰是由审计厅厅长转任的，我们不熟。在省人大一会议室仍然由我县的沙副主任汇报，其他人补充。他们听过汇报后，陆德生秘书长表示他们将把我们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向省政府转达。

我们从合肥回凤台等了一个多星期，没接到省政府或省人大的任何回应信息。但社会上对此事的强烈不满升温发酵，而且新鑫公司收费没有交警配合致使秩序比较乱，闯关逃票的车辆也多了起来。于是我驱车到了省人大了解动向。这次我并没有再去找陆秘书长或孙杰主任，而是找熟识的同志聊几句，说到新鑫公司设站收费的事。其中一位我不知姓名的年轻干部透露：省政府那边不高兴，说人大要过问交人大处理算啦！我才知悉个中缘由。

我又询问省人大能过问这件事的领导哪个在，有位同志告诉我，邵明副主任在办公室。对邵明我不熟只有有所了解，他原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年初换届转任省人大常委会排名第一位副主任。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我到邵明的办公室，向他简要汇报了情况，并说现在县里财政比较困难，如果大桥不能正常收费，不但还贷有问题，而且如果财政不能向大桥拆借资金干部发工资都可能有困难。而邵明却气呼呼地说：“发不发工资与你有什么关系，你管它弄熊啊？”。至此邵明不想与问此事而且心中有气我已感觉到，但他为什么抱这个态度，我不清楚。他似乎对省政府的表现很不满。但有一点是很清楚了：指望省市两级人大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短时间是不可能了！

进一步抗争：做决定

回到县城后我陆续接到交通局转交的几份文件复印件：其中一份是县委办公室转送县委领导人签署同意新鑫公司来凤台大山镇修筑公路的报告。我并未在意报告的具体表述，新鑫公司来凤台做了什么事已经摆在那里，来这里闹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是他们招引或许可是确定无疑的，这下得到证实了。而且县政府还为他们开了调度会发了纪要，要求要为其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让新鑫公司有利可图，为之保驾护航。当下出现的局面，他们县委和县政府显然发觉已经激起众

怒，但也泼水难收。

我们怎么办？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有求诸自己了。翻找法律条文，在《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中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职权的第四项就是“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至于什么算是“重大事项”我请教了市人大机关的有关同志，他们说，人大常委会认定的重大事项就是重大事项，并没有具体界定。

把由市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的想法，首先在写人民来信的几位老同志和县人大在任的几位领导同志中，作了酝酿协商，由于这种由人大自己动议提出意见而做出决定的情况非常少见，面对现实的问题，也是唯一可以考虑的途径。于是通过电话与县委和县政府作了沟通，就开始运作起来。我很清楚，这事不能向上级请示，也不能向同级征求意见，否则会有胎死腹中的可能。

按照常规程序，召开了党组会和主任会议，发出了会议通知。于1月20日举行了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取缔凤淮路大山段收费站的决定》并向社会发布，以正式文件向县政府发出通知。依法律规定，我们开会时还安排了县人大代表李树义和齐儒卿列席了会议，他们是御任一年多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和县政协主席。县政府和法院、检察院领导人依法列席会议。

县政府接到我们通知后安排交通局和交警队向新鑫公司宣布，并组织人员对收费站作了破坏，督促拆除。但新鑫公司根本不把《决定》放在眼里，照样收费。不过闯关逃票的明显增多了。有人在收费站散发了印有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的传单。《安徽青年报》发了“县人大和省政府在桥头撞了车”的消息。

有一天下午我在县委三楼会议室开会结束正准备回家，一位新华社安徽分社的陈姓记者找到了我，原来是为了取缔收费站的事。问我：“不准收费了，我们投进去的钱怎么办？”。我才了解，新华社安徽分社也投资入股了。我告诉他：“凤台县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各地各有关部门单位都支援凤台灾后重建，那你们出了这点修路的钱作为支援凤台灾后重建就是了。”他立刻沉不住气了，急切地说：“这怎么行？这些钱是我们私人的！”我才恍然大悟，新鑫公司原来是你们个人合伙入股分红的公司啊！我说：“那怎么搞呢？我们市人大常委会已经做了决定，我个人也没有权力更改呀！”他大声地说了：“不行的话，我们

给你曝光哎！”我故意问他：“是不是从县人大依法办事，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角度来曝光啊？”他没有回应。我思谋，我们明人不做暗事，哪能怕你曝光呢。常看《安徽内参》多次看到由他署名的稿件，在防汛抗灾中我也接触过他，不是初交了。看天色已晚就留他吃晚饭，他执意不肯，匆匆告辞回淮南去了。

送他走后一个多小时，市委书记 SXX 的电话就打到我家里。在与他电话交谈中我说了新鑫公司在凤台设站收费的简要情况和干部群众的反映，他反复强调要考虑与省交通厅的关系。意思很明白，不要取缔他们的收费站，让他们继续掠夺！我已经很明白，一系列迹象表明：省委书记、LXY、WXZ、交通厅、新华社安徽分社、淮南市和凤台县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有不知道哪些人，已经结成利益集团。又有人传给我消息：明年省委换届 SXX 正争取作省委常委呢，所以特别需要与省委书记搞好关系。

又有一次我和县政府一位负责人一起从县委三楼下来，路过县委领导人办公室门口，顺便进去打个照面，他说：“市里 S 书记说啦，告诉老张，他那个东西是错误的，叫他撤掉！”我一听就判断，这是在欺诈。“他那个东西”指的就是县人大的《决定》。我立即回应说：“到现在我还没认识到错在哪里，S 书记要有这个意见叫 S 书记直接找我谈！”他们都没接话，于是我两人离开。

1994 年的省人代会是 4 月 6 日开幕的，会前五六天，有一天上午市人大夏毓启主任来到我的办公室，也没带随行人员。他就一件事，说新鑫公司收费的事建议我不要再提了，而且他还表明他是受人委托来给我说一说的。夏主任是去年换届由副市长升任的，是我的老领导，天津大学毕业，我们个人关系也不错，而且我明白他对这件事也是很反感的。我断定是市委书记委托他来说服我的，于是我对他说：“夏主任，您的意思我完全理解，你该说的话也都说到了，必要的时候我一定证实。”

逼上梁山·质询

问题得不到解决，当然很焦急，眼看老百姓的血汗钱像流水一样进入新鑫公司的血盆大口。老百姓有理无处说，有的发发牢骚或骂几句也没人理睬。了解一些内情的人也只有观望，知道人大做了决定，县里人大领导和老干部们也到市、到省反映了意见但没有效果。省人代会的次会定于 4 月 6 日开幕也一天天临近

了，我是县里唯一的领导干部身份的代表，赴会前我注意征求大家的意见要求，我可以带到会上去。结果大家反映最集中、最强烈的就是这个问题，我明确意识到这次会议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机会。于是我把收集的有关文件、材料再认真阅读消化，并整理装袋放在行李箱里。

大会开幕前一天，我约了朱淑敏到秘书处要求面见 WXZ 副省长。她是淮南矿三院影像中心的女医生，到美国学习过核磁共振技术，是淮南市代表团副团长。（团长是夏主任，党支部书记是市委书记 SXX，请假未到会。我是支部副书记）。找到秘书处一位工作人员，我在省人大办公厅见过他，好像是信访处一位副处长。说我们要求见 WXZ 副省长，没想到他的态度很生硬地回答我们：“那怎么行，省长哪是你们想见就见的？”我们俩都是淮南代表团的代表，我们胸前的代表证上显示得很清楚。我看出这是个没烧熟的主儿，没多说就离开了。

大会于 4 月 6 日上午举行开幕式听取省政府工作报告，下午代表团会议审议。在审议发言中我简要介绍了新鑫公司在凤台淮河大桥收费的情况，并把填写的质询案给大家传阅签名。质询案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提出的，我们填写的质询对象是省长傅锡寿、副省长 WXZ，或者二者之一。其实质询副省长 WXZ 一人就够了，为了防止他借故回避，把省长也写上。质询的事项就是凤台淮河大桥收费问题。与李主任商量，他坚持要我作领衔人。后面又有 21 名代表签名附议。《地方组织法》规定有二十名以上代表联名即可提出质询案，为了万无一失，我亲自到大会秘书处交到工作人员手中。

时隔三个半天的 4 月 8 日中午，作为大会工作人员的淮南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德富到我宿舍，转告秘书处的意见，问我能否把质询改为代表约见，如果同意，WXZ 副省长一定带领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代表见面。我当即答应了。4 月 9 日上午王德富又通知说，大会秘书处安排 4 月 11 日晚上七点半在华侨饭店 XX 会议室约见，并要求我们推举三位代表参加。我和李主任商量，由我们俩再加上淮南矿业学院基础部主任程乃栋教授，作为三名代表出席，程教授也爽快地答应了。当我们三人来到华侨饭店这间中型会议室时，大部分与会人员都到了。到会的有副省长 WXZ，省人大财经委主任孙杰，省政府三办主任胡冰，省财政厅、交通厅各一位副厅长，省物价局两位处长，省公路局局长 HMH，淮南市人

大秘书长王德富。看来其他未通报姓名的都是省政府和省人大工作人员了。主持人孙杰刚说完几句开场白，WXZ就凶神恶煞般气势汹汹地发话了：“你县里的人大主任要质询我，这不我来了吗？！”我没料到堂堂副省长竟然一开始就发火，态度还这么凶恶，太缺乏政治家的风度了。于是我慢悠悠地说：“这是代表的权利。”他接着说了，有意见为什么不采取党内解决，内部解决，而要质询之类的话。我想，你签批的收费文件都被挂到大路边上去了，你去参加剪彩发表讲话谁不知道，这是党内的问题吗？我们集体到省人大反映，转达到省政府你们根本不理睬，大会开幕前到秘书处要求见你被挡驾，难道你都不知道吗？这是你们不想内部解决，逼我们提质询案呀！难道约见你还不是内部解决吗？但我明白，时间有限，不能在这些枝节问题上跟他纠缠，不接他的话茬了。于是他指使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位处长，宣读了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大桥管理问题的会议纪要。这位处长宣读的内容核心是明确大桥的管理权，由省政府委托淮南市管理，云云。读完，我发言说：“对大桥的管理体制我们没有在意，主要是新鑫公司不应该设站收费。首先，他们没有按安徽省收费管理条例规定经物价部门批准。”刚说到这里，WXZ就打断话头抢着说：“这还不容易，叫我们物价局批一下就是了。”我停下，心想，既然容易那为什么收费两个多月了，也没批呢？为什么今天的约见会省物价局的领导人一个也不来，只派两位处长来呢？我用右手食指和拇指比划了一公分多的厚度，继续往下说：“新鑫公司其实没修什么路，只是在原来的路面上盖了这么厚一层沥青。就这段路也只有2.63公里，而国家财政部、交通部、物价总局规定必须10公里以上才准许收费。还有，两部一局的文件规定，两个收费路段的距离必须在50公里以上，凤台大桥到淮南金家岭收费站只有三十来公里。”这时WXZ态度和缓地说：“我不了解情况。”而省公路局长HMH却撇着皖东腔煞有介事地说：“这个工程引进了外资哎！”这下WXZ好像抓到了救命稻草，忙说：“对，引进了外资。哎，老张，我们搞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引进外资可是不容易啊！”我立即应对：“我们来开会以前已经作了调查研究，这个工程一分钱的外资也没有！料你韩局长拿不出凭据来！”这句话使HMH这个面色本来就不白皙的小老太太立即憋得满脸紫红，一个字也没说出来。我又继续发言：“老百姓对这个事意见很大，经常有司机胡嚼乱骂。最近还听说他们正酝酿组织上千辆拖拉机到北京上访。”这时WXZ显然有些紧张起来，忙说：“不能去，一定不能去，要做好工作。”我

回应：“工作已经做过了，早就做过了，要不，早就去北京又回来了。”他连忙说：“我不了解情况，不了解情况。”我看到他的脸色也飞红了。这时，WXZ 表现得和颜悦色，开始那种气势汹汹盛气凌人的态度已经烟消云散了。我想，你说的不了解情况，实际上是没料到我们掌握了这么多情况，没被你的气势汹汹吓住，又一下戳穿了你们编造的谎言呀。新鑫公司就蒙了一块遮羞布，修了一个收费站花了几个钱？这样一本万利的生意能舍得吸收外资让肥水流入外人田吗？况且，真的引进了外资，就可以随意不按中央两部一局的规定办了吗？

整个对话过程中李主任和程教授不时地插话，不断地为我帮腔助势配合得十分默契。特别值得我记住的是，来开会之前李主任早就告诉我，已经作了了解，这个工程没有一点外资，所以我得以立即戳穿 HMH 的谎言，不然还得花费许多口舌，不会这么干净利索。这时主持人孙杰作了小结，大意是，几位代表反映了情况，也提出了要求，建议省政府抓紧时间研究处理。并宣布约见就到这里。于是我们三人离开会议室，WXZ 站在门口一侧笑嘻嘻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连说“我不了解情况。”，当他和我们握手时，我回应了一句：“这下就了解情况了。”

新鑫公司撤出

约见的第二天(4月12日)大会闭幕。13日WXZ在省政府召集了由省交通厅、省财政厅、省物价局、淮南市政府、凤台县政府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并发出关于执行XX通知的通知”，县政府把这个通知送给我办公室，我看了，实质上就是取缔新鑫公司的收费站，大桥收费完全恢复原状。我也到拐子集现场察看到，把横跨公路的气派的收费大棚拆除了。新鑫公司撤出凤台，大桥的收费主体、收费秩序、收费的标准都恢复了原状。

当时我知道大桥管理处向新鑫公司支付了赔偿款，具体数目不了解。在此文的写作过程中又向当时大桥管理处的前后两位负责人了解，据他们说，当时分期支付了数目大得非常离谱的赔偿款，认为他们太欺负人，其中有腐败，而且市里为此召开了协调会，并要求县里“你们要吃点亏”。至于具体数目，参加会议的具体人，当事人说“记不清了”。

这两个多月搜刮得到的巨额资金怎么分割的，更无可考。但知道为此积极效力的官员大都得到了提升。LXY当然近水楼台，升任蚌埠市委副书记。时过二十

二年，具体数目很可能记不准确，大概数目也没印象？他们来凤台掠夺完了，还得向他们赔款，真比庚子赔款还屈辱，比清政府还腐败无能，而且这都是暗箱操作的，最后承受损失的还是老百姓。但是，我们利用省人民代表大会这个舞台，借中央两部一局文件的威力，把新鑫公司这个掠夺老百姓血汗钱的恶魔驱逐出境——撵滚蛋了！让我感到荡气回肠，身心大快！

余韵悠悠

大桥收费在车流量最高峰的春节后回来折腾，自然引起社会关注，消息不胫而走。一般人不明就里，主流媒体更不可能宣传报道，一般老百姓乐享其成，少有人探寻幕后的风雨雷电。但在省、市、县的官场，我的所见所闻给我的思索和启发却是历久难忘的。

约见后的次日上午是大会闭幕式，在会场走道碰到孙杰，我招呼“孙主任”，他却把脸扭向旁边回避，不敢跟我搭话，感到省直机关一个正厅级官员也很可怜。有位县政府干部背后大发牢骚：“张树田都到人大啦，还想干什么？我们和交通厅的关系搞坏了，这以后的工作可怎么干啊？”消息传给我，我并不太生气，我想：斩断了伸进老百姓腰包的黑手引发一些得利者的不满，这是必然的。我到人大了还想干什么呢？不想升官也不想发财，只是看到可怜的老百姓任人无法无天地掠夺宰割，想护他们一把呗！我们赶走的是新鑫公司，怎么你们都和他们捆在一起了？你们如果和交通厅再发展“友好”关系，再引进两个收费站，老百姓还不得造反啊？你们只想和交通厅，实际上是和某些得利的官员搞好关系，难道就不怕和老百姓搞坏关系吗？以后像引进收费站这样的“工作”，你们不好干了，是百姓之福啊。

有朋友告诉我，在收费站被拆除的当天晚上，河东的众多老百姓自发在拐子集汇聚，敲锣打鼓鸣放鞭炮，表达他们的欣喜之情。不怪，大山镇有丰富的山石资源又交通便利，老百姓从事采石、加工石料和搞运输的多，有些每天要往返数次被掠夺宰割。坐地掠夺他们血汗钱的新鑫公司被驱逐了，他们能不高兴吗？

开春后我到合肥办事，路过省公路局门口，怀着好奇的心理到了HMH局长的办公室，她看到我立即站起来，气得涨红了脸，大声吼叫：“你来做什么？我不接待你！没见过你这么不顾大局的！”我也没法跟她说什么了，转身离去。我

的心情很平和，觉得这没有出乎意料，我根本没想让你接待，只是想看看你的态度。不过我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收获：我们做这些事的罪名是“不顾大局”。啊，我能顾你们这个伤天害理倚官仗势，向老百姓巧取豪夺的“大局”吗？

1995年的省人代会报到期间我到省人大办公楼去办事，在院子里正行走间，在我的侧后方有人问候：“老张，你们来啦？住在哪里？伙食怎么样？”我转脸一望，原来是副省长WXZ，我随即向他问候，作答。我想，打这个招呼虽然是刻意而为，但毕竟回归了高级领导干部应有的风度，比HMH强多了，至于他内心活动，不得而知。而从此几次碰面总是互相打个招呼，问候几句。虽然是礼节性的，但是“不打不相识”，不然他怎么能把我这个小干部放在眼里？过后，也有朋友跟我说，要不是撤了新鑫公司的收费站，老百姓闹起来，WXZ还会受到上级的追究呢。我想此言也是，WXZ也可能领悟这一点，为自己得到解脱而庆幸呢。

在这次会议期间我在省人大办公楼参加一个会议后往外走，在楼道碰到陆德生秘书长，他招呼我说，省政府某秘书长想见见我。省政府秘书长张俊我认识，这位副秘书长我根本没见过，不知何意，但想到陆德生已经白发老头儿了，我很尊重他，就答应了。过一会儿，陆德生把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同志领来了，陆把双方做了介绍，握手寒暄几句就分别了。我直纳闷，你是省政府的副秘书长，是看我长什么样吧？我猜想，是不是知道我摸了副省长的老虎屁股，会是个凶神恶煞或气度不凡？这下知道了吧？平常得很！

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王林维是颍上县人，有一次来凤台，午餐时县交通局郭局长找我奉陪，席间告诉我：“我们交通厅很多人都知道了凤台有个张主任，说你做得对，真有种，LXY胡吊来嘛！”我随口说：“都是过去的事儿啦”。

又过了两年，SXX已晋升省检察长，换CWX任市委书记。他在一次省人代会的淮南代表团会议上说：“（大意）听说我们淮南的代表在会上提过质询案，这样做以后谁还敢跟我们沾啊？我们不能再这样做啦！”我心知肚明，说的就是我。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告诫大家在人代会上不能再做得罪省里各级官员的事了。啊，三个代表，仅仅只是说给老百姓听着舒服的空话吗？你们只怕得罪上级官员，就是不怕得罪老百姓啊！我不由得这样感慨。种种迹象表明，领导们对代表的“出格”行为监控和防范又加强了。代表们很难再做出这样“不顾大局”的事了。■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l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